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六集

(B1)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六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工人哲学论文选

第六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字数 95,000

1975年6月第1版 197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2171·79 定价: 0.29元

毛主席语录

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
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
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
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
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
力量。

编 后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上海工人阶级在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包括哲学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的斗争中，取得了新的成果，工人理论队伍正在茁壮成长。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林彪鼓吹孔孟之道的反革命罪行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并以唯物史观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他们遵循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取得了抓革命、促生产的新胜利。这些经验又一次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本书收集的二十二篇文章，试图从这几个方面反映上海工人阶级自批林批孔运动以来学哲学、用哲学的新成果和新经验。作为上海工人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这块阵地的记录，这个集子今后还要编下去。欢迎广大读者提出批评和建议。

目 录

- 不信“天命”干革命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学习马列宣讲队（1）
- 开倒车是一切顽固党的特征
——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
……上海第二机床厂大批判组（9）
- 不准林彪倒转历史车轮
——批林彪的“克己复礼”
……上棉十七厂大批判组（14）
- 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
……上海东风线厂工人 沈逸珍 丁佩蓉（18）
-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反动实质
……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士耀（22）
- 戳穿“仁、勇、智”的反动实质
……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人 茅森妹
上海轴承锻造厂工人 许增兴（27）

我们初步研究法家著作的体会

……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32)

把法家放到阶级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考察

——学习革命导师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的体会

……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理论班写作组 (39)

奴隶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论先秦时期奴隶起义和儒家斗争的关系

……上海第五钢铁厂五车间
热处理工段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45)

揭露“让步政策论”尊儒反法的本质

……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
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51)

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涇

……“风庆”轮党支部 (59)

搞生产一定要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中共上海第二焊接厂支部委员会 (69)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

——上海中国电工厂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调查组 (76)

万匹机的诞生

……赵传功 (85)

- 用辩证法改造发电机
上海电机厂工人写作组 (95)
- “螺蛳壳”里天地大
上海自行车三厂第九车间党支部 (104)
- 变废为宝无止境
上海燎原化工厂革委会 (111)
- 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铁路运输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 (119)
-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挥港口装卸的一点体会
上海港务局第三装卸区革委会 (125)
- 一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 菁 (131)
-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
章智明 (140)
- 扫马路见闻
 ——在长洽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
上海师范大学 阎水金 (150)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 陆晓禾

不信“天命”干革命 敢教日月换新天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工人学习马列宣讲队

历代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总要抬出“天”来吓唬和愚弄劳动人民。孔孟之徒鼓吹什么“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赋之才”等等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和天才论，用意都是如此。其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支配一切、创造一切的“天”。历史上劳动人民在革命斗争中就曾不断地向“天”发出挑战；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的思想家法家也曾提出过“人定胜天”的思想。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天”的本质。近代，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资产阶级对天体、自然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有了较多的了解；但是，他们在社会历史观方面还是唯心主义的。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才能从自然科学领域到社会科学领域彻底揭示出“天”的本质来。

工人阶级不信“天”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哲学时指出：“世界的真

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反杜林论》)列宁进一步指出：“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就指明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而不是那种看不见摸不着，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之外主宰一切的“天”。那末，“天”的观念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又是怎样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的呢？

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由于当时生产力的低下，人们还不能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所以自然的力量被人们幻想为神秘的力量——至高无上的“天神”。随着历史的前进和生产的发展，原始公社瓦解，奴隶制度产生，阶级和阶级统治出现了。从此，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不仅有自然的力量，而且有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原来仅仅反映自然力量的幻象——“天”，开始获得了社会的属性，被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来作为他们统治的化身。反动阶级总是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统治被推翻，于是就拚命宣传他们那种人剥削人的社会秩序是“永恒”的。阶级利益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也不愿意从社会的内部原因去解释社会的变化，他们就请出“天”来为他们的统治辩护，说他们的权力是“天授”的，借以欺骗和恫吓人民。就这样，“自然”的“天”，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国家机器的护法神。

孔老二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董仲舒说：“天不变，道亦不变”；袁世凯搞“祭天祀孔”；蒋介石自封为“天降大任”的“伟人”等等，他们都抬出“天”来为他们那个人剥削人

的旧制度辩护。叛徒、卖国贼林彪大肆宣扬唯心论的“天才论”，吹嘘自己是“受于天”的“天才”，正好说明他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重要思想根源，是孔孟的反动的天命论。他妄想借助于这个腐朽的思想武器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句话，他这样做，就是利用天命论妄图实现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变天”复辟欲望。二千多年来孔孟之徒鼓吹“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骗人的历史！天命论从来就是反动没落阶级的“愚民论”和“救命论”！

然而，一切反动没落阶级愈是起劲地抬出“天”来为其剥削特权及国家机器辩护，就愈是使无产阶级明确地认识到面临的战斗任务。列宁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概括道：“打倒天：唯物主义”。这不仅从认识论上，而且从历史观上为我们指明了革命的目标。

打倒“天”，就是不信“天命”，坚信革命；打倒“天”，就是打倒反动没落阶级国家机器的“护法神”，为实现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扫清道路。

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坚信只有“革命能改变一切”。正是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才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妄图在中国重建剥削阶级“天堂”的阴谋，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工人阶级不靠“天”

无产阶级革命靠谁？靠自己还是靠那些自吹是“受于天”的“天才”？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国际歌》说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林彪一伙大肆宣扬“一灯能除千年暗，一智能灭千年愚”，把工农群众污蔑为“不辨珍珠和鱼目”的“千年愚”，说革命只能依靠他们这伙“救世主”。这是林彪反对革命，妄图“克己复礼”，复辟资本主义的又一花招。

在历次革命的紧要关头，究竟是谁最能辨别“鱼目”和“珍珠”，分清敌友，坚持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烈士的鲜血教育了上海工人阶级。当时，上海工人在一首歌谣中痛骂蒋介石把持的国民党已成了“刮民党”，揭露了蒋介石“一副假面一把刀”的反革命两面派面目，发出了“工人们要解放，首先打倒刮民党”的呼声。看，我们工人阶级对混在北伐队伍中的“鱼目”识别得多么清楚！可是，以“救世主”自居的陈独秀和刘少奇却颠倒是非，把蒋介石出卖革命，说成是革命的“胜利”，并下令叫工人纠察队把武装交给国民党。而被吹为“明灯”的林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刚开始时，却对中国革命悲观失望，丧失信心，实际上是取消革命。

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着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卖

国行径，我们上海工人又怒斥道：“蒋介石，屁不值，人不作，做国贼”。可是，恰恰是所谓“一灯能除千年暗”的林彪和“百分之百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把卖国贼蒋介石吹捧为“一切进步力量”的“最高统帅”。这不是要把中国人民“统帅”到当亡国奴的黑暗王国中去吗？

无数事实证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不辨珍珠和鱼目”的正是那些自命为“救世主”的人。无产阶级倘若靠了他们，那才真正会断送革命，而“千年暗”的旧中国也就难见光明。

我们说革命“靠自己”，就是坚持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唯心主义。我们并不认为工人阶级中的每个成员是天生的革命派。列宁说得好：“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怎么办？》）无产阶级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要靠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革命理论不能离开群众的革命实践，而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又必须依靠革命理论的指引。因此我们说，革命靠自己同革命靠马克思主义是完全一致的。

林彪出于反革命阶级本性，十分害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十分仇视群众的伟大力量，胡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是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来，而是“天赋”的。他以为只要把革命学说从人间抬到“天”上去，就可以割断革命理论同革命

群众的血肉联系，他以为鼓吹唯心论的“天才论”，就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受于天”的“天才”，就可以愚弄群众，篡党夺权。广大革命群众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革命胜利的保证。我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粉碎了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复辟阴谋，把他们这些混充“珍珠”的“鱼目”，永远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工人阶级定胜“天”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是改天换地的英雄，是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的。林彪反党集团出于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政治需要，从孔老二那里拣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破烂货，把反动统治者说成是“天生”的有智慧的人，把劳动人民说成是“天生”的愚蠢的人，作为愚弄劳动人民的反动思想武器。其实，他们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才是最愚蠢的。

毛主席指出，反动派“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因此他们的估计总是错误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按语）他们总是高估了自己的力量，低估了群众的力量，总是错误估计形势，妄图开历史倒车，最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林彪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不看文件，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就正是这样干的

和得到这样结局的。他自诩为“上智”，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最后落得死无葬身之地的下场，这不是对他自己鼓吹的“上智下愚”的绝妙讽刺吗？

什么是“智”，什么是“愚”，不同阶级从来就有不同的回答。在我们无产阶级看来，所谓“智”，就是能够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并且能够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始终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的第一线，能够不断取得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更重要的是，无产阶级有自己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上海工人阶级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在三千吨船台上造出了万吨轮；自己设计和制造了三十万千瓦双水内冷发电机；解决了外国资产阶级没有解决的控制地面沉降的问题；改写了“南柑北苹”的果树栽培史，使苹果在上海“安家落户”；做小电珠的工厂成批生产显象管；拉塌车转业的工人造出了三百吨大型平板车……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工人阶级是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的。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上海工人阶级派出了大批工宣队员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领导斗、批、改；一大批来自工农、本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登上各级领导岗位，管理着国家大事。如今，我们工人阶级又在批林批孔中发挥了主力军作用。这一切都证明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证明了我们工人阶级不信“天命”，而是要靠革命，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我们不

仅能搞经济基础，而且能搞上层建筑；我们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而且能够领导一切！

林彪反党集团已经彻底垮台了，但是他们所宣扬的孔孟之道，仍在散发出臭气。文化领域过去一向是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林彪、孔老二鼓吹的“上智下愚”的谬论流毒和影响很大。有人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工人阶级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掺沙子”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而是歧视和排斥工人群众，胡说什么工人“不懂业务”，“外行无法领导内行”等等，似乎应该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文化领域内资产阶级的一统天下，才符合“上智下愚”的“天理”。这实质上是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我们必须把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把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载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

开倒车是一切顽固党的特征

——学习《实践论》的一点体会

上海第二机床厂大批判组

三十七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哲学著作《实践论》。毛主席在这部著作中，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理，系统地总结了我国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批判了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重温这部著作，对于我们从世界观、认识论上进一步批林批孔，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推向前进了，而他们的认识仍然停止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毛主席在这里深刻地点穿了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

正确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能够反映客观规

律。离开实践的认识，只能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空想。而实践，又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客观世界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总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客观外界在变，人们的主观认识也应该随之改变，这样才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推动社会的前进。如果客观外界在变，而主观认识却还停留在旧阶段，不是跟上客观外界的变化，反而企图使变化了的客观外界适应自己落后了的主观认识，那末，表现在政治上，必然是开倒车。一切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信奉“倒过来”的即从主观到客观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他们轻视实践，脱离实践，思想落后于变化了的客观外界，偏偏又顽固地用自己这种落后了的认识去改造世界，结果必然成为阻挡历史车轮前进的顽固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头子陈独秀，不就是这样的顽固派吗？这个假马克思主义者平时也讲革命，但实际上讲的是过时了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他憧憬的“新社会”也只是过时了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从这种主观认识远远落后于客观外界变化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出发，他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反对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运动，最后滚进了反革命的泥坑。陈独秀之流的行为，恰如毛主席所强调指出的：“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的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倒过来”的思想路线，导致开倒车的政治路线，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特征。

毛主席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头子的尖锐批判，其实也是对古往今来一切反动派的有力批判。开倒车，是历史上一切顽固党的特征。两千四百多年前的孔老二，就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开倒车狂。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路线，也就是建筑在他那条“倒过来”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基础上的。孔老二一再标榜自己“信而好古”，竭力反对当时发生的社会变革。他甚至鼓吹：“最美妙的境界就是通行先古时代的历法，乘着古代的车子，穿上周朝的衣服，听从前面的韶乐。”简直月亮也是过去的圆，星斗也是过去的亮！既然古代这么好，那么“复古”即开倒车，就必然成为他一生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了。孔丘是这样，后来一切行将灭亡的反动派都是这样。他们都是孔丘的信徒，都把“法先王”、“事必师古”之类的信条作为政治上开倒车的哲学根据。

同反动阶级相反，历史上的进步阶级，由于他们的阶级利益是同社会发展规律相适应的，因而敢于面对现实，并且使自己的主观认识适合于变革了的现实，“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杰出的先秦法家代表荀子，就提倡“制名以指实”，人们的观念应随着社会变化而变化；“名闻而实喻”，人们的观念同实际相符，才是正确的认识。正是以这种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为根据，荀子在先秦儒法论争中旗帜鲜明，坚决反对开倒车的儒家路线，大力宣扬和推行主张变革、主张前进的法家路线，赞扬商鞅在秦国的变革，歌颂秦国的大好形势是“治之至也”，驳斥了没落奴隶主阶级对商鞅变革的攻击和对秦国形势的诬蔑。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继承和发扬了

荀子的思想,在认识论上“鄙视以往、迷信将来”,在政治上主张对奴隶主阶级实行专政,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作了思想上、舆论上的准备。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先秦法家尚且如此,那么无产阶级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它更是旧世界的摧毁者和新世界的创造者。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这是无产阶级鲜明的阶级特性。

是开倒车、逆历史潮流而动,还是坚持革命、顺应历史潮流而前进,这是由各个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革命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它能够经受而且迫切需要进行社会变革,改革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和推动历史车轮的前进。反之,反动没落阶级代表着腐朽的生产关系,这种阶级地位注定它是妄图倒转历史车轮的小丑。因为如果它承认和服从变革着的现实,那就等于宣告它自己的灭亡。这种前进与倒退的斗争,往往在一场革命的暴风骤雨刚刚过去的时候,显得分外激烈。列宁说得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高枕无忧。”革命,对反动阶级是一种剥夺,因而必然遭到反动阶级的疯狂反扑。而开倒车,正是这种反扑的集中表现。反动阶级要复辟,要倒退,革命阶级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反复辟,反倒退,维护革命的成果。于是,一场大革命硝烟未散,围绕着开倒车还是反开倒车的阶级斗争就又兴起了。就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来说,这场革命的伟大胜利,引起了国内外反动派的极大仇恨和恐惧。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正

是代表着这一小撮反动派的利益，跳出来大肆攻击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妄图开历史的倒车。这场伟大的革命，在他眼里看来，是“极左”，是“危机四伏”，简直一无是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他这也看不顺眼，那也看不顺眼；说什么这是“变相劳改”，那是“变相失业”，简直一塌糊涂。他跟孔老二一样，顺他眼的就是那些被革命否定掉的陈年百古破烂货。然而他跟孔老二相比，真是有过之无不及，他欣赏的不仅是越古越好，而且要越洋越好，他的倒车最终是要开到莫斯科新沙皇的膝下去！无奈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來的，林彪不是同一切孔老二信徒那样明明白白地失败了吗？

一切反动派的开倒车的路线，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毛主席告诫我们：“**以科学的社会实践为特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反对这些错误思想。**”要反对这些思想，我们的同志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深入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时时与人民群众保持紧密联系，使自己的思想随着变化了的情况而前进，以适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只有这样，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识别与抵制反动派宣扬的“倒过来”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和开倒车的政治路线，自觉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为革命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载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日《解放日报》）

不准林彪倒转历史车轮

——批林彪的“克己复礼”

上棉十七厂大批判组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时隔二千多年，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又重弹“克己复礼”的老调，用意何在？

林彪日思夜想“克己复礼”，这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一九六九年十月到一九七〇年一月，正当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全国人民沿着九大路线乘胜前进的时刻，林彪在此时此刻接二连三书写了“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的条幅，把“克己复礼”当作最大的事，并且“唯此、唯此”反复强调，这显然是要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资本主义之“礼”。反革命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克己复礼”的反革命实质！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场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揪出了

牛鬼蛇神，批判了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夺回了被资产阶级所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场大革命非常及时，完全必要。但是，林彪这个地富反坏右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眼看刘少奇叛徒集团垮了台，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复礼”。在他的《“571工程”纪要》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中，狂叫要进行“一场新的夺权斗争”，要同革命人民作“你死我活斗争”，真是嚣张至极。他要夺谁的权呢？就是要夺我们在“一月革命”风暴中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回的权，就是要夺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林彪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复礼”的反革命狼子野心，不就昭然若揭了吗！我们工人阶级最懂得政权的重要性。我们厂是个有五十多年历史的老厂，许多老工人解放前为啥做牛做马受欺压，就是因为政权掌握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解放后为啥我们能翻身当家作主人，就是因为在毛主席英明领导下，劳动人民掌握了政权。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一伙为啥能够干坏事，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我们工人起来造他们的反，为啥会受迫害，甚至被打成反革命？主要是因为他们窃取了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权力。“一月革命”风暴中，我们夺回了这部分权力，把全厂的党政财文大权掌握在无产阶级自己手里，使毛主席革命路线进一步得到了贯彻执行。我们取得了胜利，但将要灭亡的反动阶级总是要进行最后挣扎的。林彪扯起了孔老二“克己复礼”的破旗，“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就是妄图反夺权，把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拉回到半封

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去。若让林彪复了“礼”，我们劳动人民就要被打入地狱，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我们怎能容忍！

林彪为了实现其反革命的“复礼”目的，采取了孔老二那套“克己”的手段。孔老二说，要以“以屈求伸”的办法保全自身，林彪就搞“暂栖身”、“韬讳”之计。孔老二说，小事上不能忍耐就会坏了大事，林彪就说，“岂可为了一区区小人，区区小事而耽误自己终身大事”。孟轲说，大人物说话不一定兑现，行动不一定做到，林彪就说，“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孟轲说，讲人家不好的地方，招来后患怎么办呢？林彪就搞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的“三不”主义。由此可见，林彪是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克己”从来就是一切反动派搞反革命的惯用手法，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强大的条件下，阶级敌人懂得，如果不夹紧狐狸尾巴搞“克己”，他们的“复礼”阴谋就会马上原形毕露，连一天也混不下去。林彪一手搞“克己”，一手策划反革命政变，手法比他的祖师爷孔老二有过之而无不及。

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是长期的。自从孔老二抛出“克己复礼”这个反革命复辟纲领以来，我国历史上的反动派都用它来反对革命，镇压人民。宋代的反动儒家朱熹把“克己复礼”吹捧成“千圣相传心法之要”，作为进行反动统治的法宝。清朝刽子手曾国藩，也把“克己复礼”作为“支配万事万物”的准则，用以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把“克己复礼”订入国民党《党政工作人员须知》手册，

作为复辟蒋家王朝的“精神基础”。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一切反动阶级都要搞复辟，开历史倒车，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我们粉碎了刘少奇叛徒集团以后，不是又出了林彪反党集团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可辩驳的伟大成就面前，不是仍然有人在背地里恶毒攻击、咒骂吗？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过的封、资、修的东西，不是又有“回潮”，或者以新的形式出现了吗？文化大革命斗批改中涌现出来的一些新生事物，不是还有人百般挑剔、甚至阻碍、扼杀吗？社会上的反动思潮在我们厂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现实斗争的事实，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长期性，我们要革命，要前进，国内外一切阶级敌人总是要阻碍革命，开历史倒车。因此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发扬“一月革命”精神，深入批林批孔，挖掉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祖坟”，使他们“克己复礼”的复辟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历史的车轮是不可抗拒的，“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林彪梦想“克己复礼”，开历史倒车，其结果只能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没落阶级代表一样，被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碾得粉身碎骨，自取灭亡。

（载《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中庸之道是政治骗子的哲学

上海东风线厂工人 沈逸珍 丁佩蓉

两千多年前，孔老二把中庸之道奉为最高的道德。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林彪又称中庸之道是“合理”的。两个骗子，一脉相承。真是无独有偶。

何谓中庸？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朱熹有一个注脚：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经过这一番解释，此道看上去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实际上却是一个弥天大谎。

在阶级社会里，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都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因而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各个阶级之间，不可能有统一的思想理论、道德观念。恩格斯说过：“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世界上那有什么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我们受过阶级压迫的工人都懂得，资本家必然要偏向资本家，工人当然也一定是偏向工人。正如鲁迅所说的：“在现今的世上，要有不偏不倚的公论，本来是一种梦想”，不管作者如何将真象掩盖起来，偏和倚，总要从他身上表现出来的。

中庸之道是一种骗人的哲学。孔老二鼓吹中庸，有其鲜明的阶级内容，是深刻地打上奴隶主阶级的烙印的。中庸的目的，就是要“复礼”，复辟西周奴隶主阶级的等级制度。凡是主张倒退的，就一定要骗人，但是，这种骗人的哲学又总是为他们自己的行动所戳穿。就拿孔老二来说，他的一生使尽了反革命权术，八面玲珑，貌似公允，实际上是伺机而动，一遇机会，就显露出凶残横暴的本相来。孔老二一口一个仁者“爱人”，但他从来就没有爱过一切人，爱的只是反动的奴隶主。他一上台，就杀了少正卯，堕三都，什么杀人、毁城的事都干出来了，这算什么仁者“爱人”？根本是在骗人。号称“亚圣”的孟轲，对孔老二的这套骗术，也心领神会，说什么“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公开宣扬骗人有理。历史上鼓吹中庸之道的，都是一些政治骗子。朱熹的伪道学就是这种骗人哲学的标本之一。那个视中庸为“圣人之言”的曾国藩，倒是以“杀人如剃头”的大刽子手而闻名。蒋介石一面高喊中庸之道，一面却挥舞屠刀，大肆屠杀革命人民。叛徒、卖国贼林彪也是这样。他在鼓吹中庸之道的时候，却在暗地里磨刀霍霍，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用极其残暴的法西斯手段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镇压广大革命人民。总之一句话，中庸之道，不过是反动派镇压人民群众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要用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一切问题，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历史，观察社会。“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

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在阶级社会里，奴隶主和奴隶，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这些根本对立的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那里谈得上什么中庸之道、不偏不倚呢？林彪鼓吹中庸之道，目的就是想用它来麻痹革命人民的斗志，放弃同帝、修、反和国内地、富、反、坏、右的阶级斗争，好让他们这伙坏蛋去搞复辟。林彪用中庸之道，恶毒攻击我国人民的反修斗争，妄图投降苏修，把我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我们一定要识破他们这种反革命伎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只有坚持斗争，才能扫除一切害人虫，才能斗出一个无产阶级的世界来。

孔孟和林彪鼓吹的中庸之道，表现在哲学上，就是折衷主义，调和论，在一切尖锐的斗争面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这也正是一切机会主义分子惯用的手法。机会主义者为什么要掩盖自己的观点呢？因为他们是一群混在工人队伍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是革命队伍里的蛀虫，他们需要掩盖自己的真象。林彪一伙有句自白：“谁不说假话，谁就得垮台”，这不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机会主义者骗人哲学的反动实质吗？他们需要用这种骗人的哲学，给自己的脸上贴金，需要用中庸之道来蒙蔽人民的眼睛。假象毕竟是假象，真象迟早总要暴露，他们总要错误地估计形势，跳出来，撕破自己的假面，把真象告诉大家。到头来只能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林彪的下场不就是如此吗？

共产党人从来是开门见山,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的。因为我们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因为我们不谋私利,光明正大,特别是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更是旗帜鲜明,敢于斗争,敢于坚持原则。这是共产党人应有的品德。

孔老二垮台了,林彪也垮台了。但是,批判孔孟和林彪所鼓吹的中庸之道,仍然是我们当前一项重要的战斗任务。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二期)

揭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的反动实质

上海吴泾热电厂 郭企元
上海重型机器厂 黄士耀

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一再宣扬什么待人要“以仁爱之心”，“以宽宥原谅之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谬论。这一套是从反动阶级的“圣人”孔老二那里拣来的腐朽货色。

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自己所不喜欢的东西，不要加到别人身上”。乍一听，是何等的迷人悦耳啊！可是，我们劳动人民通过自己长期切身痛苦的经验，早就看穿了这种谬论的反动本质。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存在着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是剥削阶级压迫、剥削被剥削阶级，就是被剥削阶级起来打倒剥削阶级，从来也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剥削阶级之“欲”，必为被剥

削阶级所“不欲”。反过来，也是一样。孔老二是“恕道”的发明人，可他实行过没有呢？没有。比如，“死”，这大概是孔老二所“不欲”的吧，那么他是不是不以“死”“施于人”呢？实际上，他却偏偏爱杀人，置人于死地而后快。这个满嘴“恕道”的“巧伪人”，就亲手制造了两起血淋淋的残杀事件：一是为了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杀了革新派人士少正卯；二是为了维护奴隶主的尊严，下令残害了在齐鲁两国国君夹谷相会的会场表演节目的艺人。这证明，开口闭口“恕道”的孔老二，实际是个一点也不“恕”的法西斯刽子手。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所“不欲”的东西，是一定要“施于”奴隶、农民和工人的，历来是这样。奴隶主是不愿当奴隶的，却偏要广大奴隶世代代作奴隶；地主、资产阶级是不愿作牛马的，却偏要广大农民、工人过着连牛马也不如的痛苦生活。在万恶的旧社会，我们工人都有一本血泪帐，挨皮鞭打，住滚地龙，吃猪狗食。资本家花天酒地的剥削阶级“欲望”越旺，施于我们工人的压迫剥削就越残酷。总而言之，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是己所不欲要施于人，与孔老二的骗子哲学正相反。所以，一提起那个“恕道”，我们工人就怒火满胸膛。戳穿了看，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就是欺人之道，吃人之道。

恕道、恕道，明明做不到，那为什么从孔老二到林彪都要提倡这一套呢？这自然也是有原因的。孔老二讲“恕”，用之于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是妄想要大家在所谓“礼崩乐坏”的残局面前同舟共济，死死地抱住奴隶制的旧秩序，为

“复礼”而“克己”。用来对付奴隶们和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则可以劝诱他们不要“犯上作乱”，不要变革，不要暴力革命，以维持正在急剧崩溃中的奴隶制。总之，讲“恕”是为了“复礼”，即复辟。孔老二对奴隶们的反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怕得要死，就用“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套来骗人，这实际上是一种阶级调和论，是麻醉剂。所以，后来的一切反动没落的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为了麻痹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缓和激化了的阶级斗争，都喜欢提倡这个“恕道”。一切反动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从来没有实行过什么“恕道”，又决不肯将“恕道”束之高阁，而且越是残酷无情地镇压劳动人民的反动派，嘴里越是要念着“恕道”，这个秘密被鲁迅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就说过：“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这些人面东西的秘密。”鲁迅所看透的这个“秘密”告诉我们，几千年来之所以总有一些人要抱住“恕道”招摇撞骗，原来是恶鬼装菩萨有这种特殊的需要。

列宁曾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第二国际的破产》）从孔老二到林彪的一切伪装菩萨的恶鬼，都是一身兼二任，既是刽子手，又是牧师。这些家伙讲“恕道”，是为了“使民杀而不怨”，是为了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和统治。

在旧社会，剥削阶级对我们劳动人民从来没有搞过什

么“恕道”；在今天，在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对于被打倒的剥削阶级，能够讲“恕道”吗？不能。搞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打倒叛徒、卖国贼林彪之类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林彪一伙对此怕得要死，于是就装出一副菩萨心肠，哼哼唧唧地念起“恕”经，宣扬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妄图用这种腐朽的孔孟之道麻痹我们的思想，解除我们的思想武装，以便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什么待人要“以仁爱之心”，“以宽宥原谅之恕”，难道无产阶级能以“仁爱之心”待资产阶级，而不讲阶级斗争吗？对于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我们能报以“宽宥原谅”，而不加以反击吗？如果依了林彪一伙的话去做，对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讲“恕道”，搞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就意味着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复辟，意味着被打倒的反动阶级重新上台。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无产阶级不需要隐瞒自己的观点，从来就公开表明对敌人是不施“仁政”，不讲“恕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们鼓吹孔老二的“恕道”，我们就一定不能对敌人讲“恕道”；他们抬出孔老二来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一定要为巩固无产阶级

专政而斗争。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根本利益相反，欲望相反，一个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个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决不可能有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无产阶级专政，一切反动派不用说当然是“不欲”的，而我们革命人民则必强“施于”他们，这是毫无疑义的。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戳穿“仁、勇、智”的反动实质

上海第五钢铁厂工人 茅森妹

上海轴承锻造厂工人 许增兴

孔老二提出的“仁”、“勇”、“智”，曾经被他的徒子徒孙们吹捧为“通行于天下的美德”。的确，这套“美德”封建地主阶级要利用，资产阶级野心家林彪一伙也要利用，而且还被林彪披上现代的时装，叫做“团”、“斗”、“唯物论”了。此间必有奥妙。

“仁”、“勇”、“智”究竟是什么货色呢？孔老二解释：“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你只要做到了“仁、勇、智”，就会不忧虑，不迷糊，不惧怕，简直是一帖万灵丹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听来悦耳，只是不可信。孔老二称得上是最高的“仁者”了吧，他能不“忧”？奴隶们“犯上作乱”，新兴地主阶级闹变革，搞出了一个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孔老二“累累若丧家之犬”，难道“忧”得还不够吗？孔老二讲“仁”，核心是“克己复礼”，什么“孝”、“悌”、“忠”、“恕”一大串，都是为“复礼”服务的。孔老二讲“知”（智），实质是先验论。又是什么“生而知之”，又是什么“惟上智与下愚不移”，

把奴隶主说成是天生的“上智”，奴隶们是天生的“下愚”，不可改变，还不都是为了“复礼”。孔老二讲“勇”，“标兵”是子路。他因为“吾闻君子死而冠不免”，宁可“结缨而死”。孔老二对子路大加赞扬，就表明他的“勇”，实际上是维护奴隶制的卖命精神。很清楚，所谓“仁、勇、智”，不过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修养经。孔老二把它称为君子之道，目的是希望腐朽没落的奴隶主统治阶级按照这套道德规范去修身、养性、治国，“克己”以“复礼”，一步一步去重振风雨飘摇之中的奴隶制残局。

孔老二的这套道德经，是“通行于天下”的吗？当然不是。恩格斯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特殊的道德，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道德又怎么能通行于天下呢？奴隶主阶级要通行的“美德”，广大奴隶则一定是行不通的。孔老二一说起“仁”，总是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可见被孔老二称为“小人”的奴隶中间是没有“仁者”的。他又说，“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这就是说，对奴隶们讲仁，只是便于奴隶主阶级的使唤。孔老二说“智”，也只是对奴隶主阶级而言，对于奴隶，他则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区区小民是只配老老实实听奴隶主的指挥，不配接受知识的。孔老二说“勇”，象子路那样的人是称为勇士的，而奴隶呢，“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小人如果具有这种勇武精神，那简直是盗贼

的“犯上作乱”，孔老二怎么能容得下呢？可见，在不同的阶级之间，阶级实践不同，阶级利益根本相反，道德也一定是互不相通的。所谓超阶级、超人类的“通行于天下的美德”，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

既然是各个阶级的道德互不通行，林彪又为什么口口声声要“吸其内容”，“用其内容”呢？其实，说不通吧，也有相通之处。孔老二和林彪虽然处于两个不同的时代，但就他们都是剥削阶级中的没落阶级的代表这一点来说，是相同的，因而都需要用没落阶级的道德观作为他们反革命行动的精神支柱，给垂危的反动没落阶级打强心针。所以，共同的阶级特征、反革命政治需要和反动思想体系，使得他们在道德观上也一致起来了。

林彪所谓的“用其内容”，决不是简单的袭用，而是从本阶级的政治利益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经过改造制作的。不是吗？林彪一伙颇为欣赏的“温文”、“豪放”、“理智”等词，其实就是“仁、勇、智”的翻版。林彪宣扬“温文”，也即是“仁”，是要其反革命死党的思想行动符合复辟资本主义的要求，并按照这个要求做到相互团结、同舟共济，以“仁”来结成反革命的神圣同盟。也就是说，要求其死党对林家父子必须以“仁爱之心”待之，用他们的习惯用语来说，就是要“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无限信仰”、“无限崇拜”，死心塌地跟着他们搞反革命复辟。他讲理智（智），则是要这些反革命骨干们精心研究反革命策略，用所谓“以屈求伸”、“韬晦之计”、“三不”主义来掩盖反革命阴谋。他讲豪放（勇），

是要那些反革命的亡命之徒们发扬“江田岛”精神，敢于“破釜沉舟”，“不成功便成仁”，如此等等。林彪拚命向他的死党灌输这种没落阶级的道德经，当然不是要他们离开同无产阶级的斗争搞单纯的修身养性，而是要把他们一手训练成符合这种反动道德标准的铁杆反革命，阴谋发动反革命政变。这就是所谓在“新的历史内容上”的“用其内容”。

然而，赤裸裸地袭用反革命道德不是显得太露骨了吗？林彪一伙既要用反动思想糟粕，又要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这显然是矛盾的。为了使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干脆来一个“归纳法”，把“仁”、“勇”、“智”归纳成“团”、“斗”、“唯物论”。这样一来，两种绝然不同的思想体系被划上了等号，反动奴隶主阶级的思想糟粕被“归纳”成“马克思主义”了。“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但是，拙劣的偷换术又怎么能掩盖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径呢？只要仔细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林彪把孔老二的“智”换成“唯物论”，是用唯心论的先验论冒充辩证唯物主义；用“团”代替“仁”，是把反动的人性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把“勇”比之为“斗”，是歪曲马克思的斗争哲学。这又是反革命三字经的另一妙用。正如列宁指出的：“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

一切机会主义分子在理论上都是一窍不通的。他们只能到反动阶级的思想武库中去吸取一些糟粕，用以继续骗

人。但无论如何,终究填不满他们思想上的贫乏,精神上的空虚,任何反动思想的灵丹妙方都决计挽救不了反动阶级灭亡的命运,这是一条不可移易的客观规律。

(载《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我们初步研究法家著作的体会

上海第五钢铁厂二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什么要研究法家著作呢？叛徒、卖国贼林彪疯狂攻击秦始皇，恶毒咒骂法家是“罚家”。林彪为什么对法家这样刻骨仇恨？开始我们还弄不清楚，感到需要进行研究。但是有人说：“什么儒家、法家，我们又不是历史学家，何必替他们分家。”一部分同志虽然觉得需要研究法家著作，但又讲不出道理来。五月四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十五周年》的社论，总结五四运动反孔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没有把儒家和法家的斗争看作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他们反对儒家是很对的，却没有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法家的著作也缺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因而也就不可能彻底打败儒家思想。”这段话给了我们很大启发，使我们认识到：研究法家，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事，而是关系到批林批孔斗争能否进行到底的大事，我们工人阶级是批林批孔的主力军，就必须认真研究法家著作。两个多月来，我们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和群众一起，先后选了商鞅、

荀况、韩非、王充、曹操、柳宗元、王安石、王夫之、章太炎等从先秦到明清的法家和进步思想家的二十多篇著作，译成白话文，并对其中的十四篇进行注释和试评，供大家阅读参考。在此基础上，又组织力量，试着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联系现实斗争，重点研究了商鞅的《更法》，荀况的《王霸》、《王制》，韩非的《五蠹》，王充的《问孔》，柳宗元的《封建论》，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等七篇法家著作。

两个多月来，我们抓住法家著作的基本观点，把研究历史和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用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联系现实斗争，深入批判林彪和孔老二的反动谬论，初步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法家坚持社会变革的进步历史观，反对儒家复古倒退的反动历史观。例如商鞅的《更法》篇中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商鞅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变法为处于社会大变革中的秦国制定了一条进步的思想 and 政治路线，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更法》篇是在秦国变法前夕商鞅和当时反对变法、维护奴隶制的顽固派之间一场大辩论的纪录。当政的奴隶主贵族的代表甘龙、杜挚宣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的谬论（意思是：按照奴隶制的老一套办事不会有过失，遵循奴隶制的“礼”不会出差错）。商鞅针锋相对地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就是讲：治理国家不能只按老一套，只要有利于治理国家的，就不必要效法古代。商鞅主张“不法古”、“不循礼”，就是要废除维护奴隶制的“周礼”，这是要求进步、要求变革的

主张，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而甘龙、杜挚宣扬“法古”、“循礼”，就是妄想永世保存奴隶制度，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斗争的结果是商鞅战胜了甘龙、杜挚。这证明了：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进步阶级必然战胜反动阶级，封建制必然取代奴隶制，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商鞅，坚定地站在法家立场上，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君亟定变法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之也。”（意思就是说：对进步主张，要有决心坚持到底，不要怕人议论；对错误东西，要坚决进行斗争，不要怕人打击）他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是很可贵的。这场斗争告诉我们：要革命，要坚持进步主张，就必然会遭到形形色色的复辟势力的抵抗。过去有甘龙、杜挚之流对商鞅变法进行疯狂攻击；今天不是也有林彪之流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猖狂的反扑吗！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就是要搞复辟，要倒退到旧社会去。工人们说：“林彪和孔老二，都是我们工人阶级的死对头。”我们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知难而进，把这场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革命、反对复辟的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

第二，法家坚持国家统一、反对分裂的观点，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符合人民的愿望。儒法斗争发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主张实行郡县制，建立统一的、封建的中央集权国家；儒家代表反动势力，拚命维护诸侯分封割据的奴隶制国家。这种统一与分裂的斗争，郡县制与分封制的斗争，是当时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韩

非说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秦始皇根据这个思想，制订了统一中国的政策，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但是，统一和分裂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九百多年，到了唐朝后期，孔老二已被捧为文宣王，而藩镇割据势力十分强大，搞独立王国，削弱中央集权，造成严重的政治危机。代表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进步思想家，不满现状，要求改革，柳宗元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之一。他的代表作《封建论》，总结了自秦汉到初唐时期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制的历史经验，充分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的历史功绩，论述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的必要，驳斥了否定秦始皇的儒家谬论。他指出：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废除了原来的分封制度，实行了郡县制的中央集权统治，控制着全国的局势，这就是秦始皇的重大功绩。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还针对当时的分裂势力，进一步强调唐朝必须坚持实行中央集权制。他指出：“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就是说：唐朝兴起后，把全国的行政区划分为“州”和“邑”，派出了驻守地方的长官，这都是做得合适的。现在我们国家普遍实行了郡县制度，统一委派了地方长官，这样的制度是牢固不可改变的。）在研究《封建论》时，我们回顾历史，看到国家的统一，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愿望，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从秦始皇第一次统一中国两千多年来，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国家是统一的，分裂的时间不到三分之一。其中，不管反动势力怎样搞阴谋，闹分裂，

统一的局面始终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今天，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和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奴役，我们的国家空前统一，我们的人民空前团结，我们的祖国欣欣向荣。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的那样，“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卖国贼林彪出于反革命的需要，尊儒反法，攻击秦始皇，其罪恶目的之一，就是破坏统一，妄图分裂。他纠集死党，妄图另立中央，分裂我们伟大的党，分裂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卖国投降的阴谋。我们工人在旧中国尝够了帝国主义瓜分、军阀混战的滋味，我们深深体会到，搞分裂就是搞倒退，搞分裂就是搞复辟，搞分裂就是要卖国，就是要让我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让我们吃二遍苦，我们坚决不答应！

第三，对内坚持革新，反对守旧；对外抵抗侵略，反对妥协投降，这是法家坚持的进步主张。王安石变法是在北宋中叶，当时宋王朝对外面临西夏和辽国的侵略，软弱无能；对内是大官僚大地主集团大量兼并土地，残酷剥削农民，造成了宋王朝的严重政治危机。王安石代表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蔑视孔孟的反动信条，勇敢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意思是说：自然界的变化不值得害怕，旧的传统不能作为依据，流言蜚语用不着理睬），同大地主阶级反动守旧的政治路线相对抗，主张变法，抑制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充实国家财富，养兵备战，抗击外来侵略。这样一来，就严重地侵犯了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利

益，引起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代表人物司马光的强烈反对，他力图用孔孟之道维持旧制度，妄图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和特权。司马光气急败坏地给王安石写了一封反动书信，用所谓侵夺官吏职权、惹事生非、征收民利、拒不接受别人意见这四大罪状，对王安石变法进行恶毒的攻击。

王安石立即写了《答司马谏议书》的回信，对司马光之流的猖狂进攻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王安石指出：我用以前法家的政策措施，来兴利除弊，这不能算惹事生非；为天下人理财，这不能算与民争利；我对于谩骂和攻击变法改革的人进行反击，不能算是不接受别人意见。王安石在这封仅仅三百多个字的回信里，义正辞严地逐条批驳了司马光的荒谬言论。司马光的反动书信是在公元一〇七〇年写的。这个时期，王安石排除顽固势力干扰，取得宋神宗的支持，收复了大片国土，打击了西夏等国侵略者的野心。王安石指出，不实行变法，“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无法抵抗侵略者的侵略。他主张武装边疆人民巩固边防，加强国防力量，以对付辽、西夏等国的侵略者。由于王安石坚决主张反侵略，曾一度取得“熙河大捷”，收复了许多失地。顽固派对王安石坚决反侵略的方针，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在敌人的压力下，司马光提出“弃地”（放弃失地）的投降卖国理论。他无耻地说：“宁可叫老百姓吃亏，也不能激怒敌人，免得他们加紧侵略。”他还胡说什么：“那些边境地区，收复了也没有用，还不如送给他们，反而会使他们感恩戴德。”司马光的同伙文彦博也丧心病狂地说：“不给他们土地，就要打仗；如果给他们

土地，就可以保证几年里没有事。”这充分暴露了这伙顽固守旧派又是彻头彻尾的投降派、卖国贼。通过这一番研究，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王安石和司马光等顽固派的斗争，既是革新和守旧的斗争，也是爱国和卖国的斗争。

联系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我们看到在革新与守旧、爱国与卖国的问题上，总是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在九百年前的北宋，司马光要翻“变法”的案，要弃地、投降，大吵大闹一场。几年前，林彪要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给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大好形势加上种种罪名。我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林彪攻击这是“做绝了”。我们坚决反帝反修，林彪却攻击这是“整苏联”，别有用心地宣扬什么“两斗皆仇，两和皆友”，妄图把我国置于苏修的“核保护伞”下，沦为苏修的殖民地。这说明林彪同司马光等尊孔派一样，都是一小撮汉奸、卖国贼。通过这样对照分析，我们进一步看清了林彪丑恶的叛徒嘴脸和他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然而，历史的车轮岂能阻挡！孔老二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周公了；司马光在历史上遗臭万年；林彪叛党叛国，狼狈投敌，自我爆炸，葬身于沙漠。

经过两个多月来的研究，提高了我们对儒法斗争实质的认识，纠正了某些同志的模糊观点。同志们深有体会地说：“儒家、法家从来就是对立的两家。儒家和林彪是一家，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是一家，和帝、修、反也是一家。”

（载一九七四年七月十一日《文汇报》）

把法家放到阶级斗争的 特定环境中去考察

——学习革命导师关于评价
历史人物的论述的体会

上海工人政治学校理论班写作组

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家、研究儒法斗争史，总结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借以指导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当前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最近，我们就如何正确评价法家人物问题，初步学习了革命导师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论述，深深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它既为无产阶级开展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指明了方向和道路，也给无产阶级正确认识历史经验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除原始社会以外，“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写的第三版序言中指出：“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

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列宁在《论国家》中则进一步指出：“……人类史上的每一个大的时期（奴隶占有制时期、农奴制时期和资本主义时期）都长达几千年或几百年，包含许许多多的政治形式，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政治见解和政治革命，要认清这一切异常繁杂的情形，特别是与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的政治、哲学等等学说联系着的情形，就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革命导师的这些精辟论述，深刻地阐明：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从当时具体的阶级斗争这一客观实际出发，把这些人物放在特定的阶级斗争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看他们代表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反映了哪个阶级的愿望，对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一基本指导线索，才能正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运用马克思主义这些基本观点去研究儒法斗争史，分析法家人物，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人与个人、学派与学派之间的斗争，更不是什么“狗咬狗”的斗争，而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各个历史时期的法家人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有其深刻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每当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时候，儒法斗争也必然在劳动人民反抗压

迫与剥削的斗争的推动下随之激化起来。这时，一些著名的法家人物也就在激烈的斗争中相继涌现。这可以说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例如，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出现在奴隶与奴隶主的阶级斗争导致社会大变动的战国时期；汉高祖刘邦、王安石等法家，先后受农民起义的推动而登上政治舞台；汉武帝刘彻、桑弘羊、王夫之等人的名字，又都同反抗外族侵扰的斗争紧密相联。这些法家人物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产生，他们的思想——法家思想，从一开始就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改革旧的生产关系、取代没落奴隶主统治的政治主张，具有鲜明的阶级内容。而站在法家对立面的儒家，则反映了行将灭亡的反动阶级的意志和愿望。法家同儒家各自代表着两个互相对立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他们之间的斗争尽管在各个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但归根到底都是革命与复辟、前进与倒退、革新与保守、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其实质都是当时整个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

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和陈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历史上许多法家代表人物过去都不同程度地被歪曲和贬低了。今天，我们要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对这些法家人物作出正确的评价，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把他们放在阶级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加以考察。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就以对汉高祖刘邦的评价来说，只有认真分析他当时所处的阶级斗争的特定

环境,看他站在哪个阶级的立场,执行什么路线,才能找出正确的答案。秦末赵高篡权之后,实行了一条“克己复礼”的复辟倒退路线。赵高的反动统治刚维持了九个月,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就如惊雷般地爆发了。农民运动如同滚滚的洪流,奔腾澎湃,势不可挡,终于击碎了赵氏政权这块阻碍历史进程的顽石。但是,代表奴隶主利益的六国旧贵族却阴谋窃取农民革命的成果,妄图割地称王,重新恢复诸侯割据的局面。这时,反对分裂,重新统一中国,巩固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制,继续秦始皇所开创的事业,就成为地主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刘邦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的特定条件下,凭借秦末农民革命所奠定的物质基础,肩负起这一历史重任。他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反对分裂倒退,消灭了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西楚霸王”项羽,与此同时也扫灭了一批异姓王,重新统一了中国。他在政治上,坚持法治路线,继承秦始皇“事皆决于法”的法家传统,反对儒家的“礼治”;在经济上,推行法家奖励耕战的政策,还把所占领“园囿之地”交给农民耕种;在组织上,“任人唯贤”,“使天下之士归于汉王”,排斥“任人唯亲”的儒家路线;在思想上,则摒弃孔儒学说,一再痛斥反动儒生为“腐儒”、“竖儒”,甚至干脆摘下儒生的冠帽当“溺器”。这些事实充分说明,刘邦是在复辟与反复辟的阶级斗争中涌现的杰出法家人物,他不仅同项羽之流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就整个历史过程来看,他是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在历史上是作出了较大的贡献的。

再以汉武帝刘彻来说，过去不少史学家都因为他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而把他称为儒家。其实，这是只看现象而不看实质。历史现象是复杂的，不能简单化。从当时阶级斗争的具体情况来分析，就可以看出，汉武帝实际上是一个法家。我们知道，在西汉初期和中期，民族矛盾曾经上升到主要地位。匈奴奴隶主贵族为了掠夺的需要，经常对西汉发动侵扰。围绕着如何对付匈奴贵族的横蛮进攻，儒家和法家开展了激烈的斗争。儒家站在反动奴隶主阶级的立场，竭力鼓吹妥协投降。法家从新兴地主阶级利益出发，主张坚持抗战，击败匈奴。汉武帝刘彻面对匈奴奴隶主贵族、没落奴隶主残余、地主阶级保守派三股反动势力内外呼应的猖狂进攻，毅然任用了杰出的法家人物桑弘羊，对内推行了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法家路线，对外采取“守御征伐并重”的战略方针，坚决反对儒家投降主义的“和亲”政策。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民族斗争与民族内部的阶级斗争除了各自包含有不同的内容与特点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把刘彻放到当时阶级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考察，就可以明确地看出他是一个法家。

当然，不论刘邦、刘彻或其他法家人物，都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反孔斗争，也不可能象历史上劳动人民的反孔斗争那样坚决和彻底。因此，我们在把法家人物放到阶级斗争的特定环境中去考察时，既要看到他们当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又要看到他们的阶级局限性；既要

恰当地评定法家人物在历史上反孔斗争中的积极作用，又要充分认识劳动人民是反孔斗争的主力军，坚决肯定奴隶暴动、农民起义是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前进的真正动力。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東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東西。”只要我们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基本原理，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善于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我们就能对法家人物作出科学的正确结论，就能运用历史经验来指导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推动批林批孔运动更加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把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进行到底。

（载一九七四年九月二日《解放日报》）

奴隶们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论先秦时期奴隶起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

上海第五钢铁厂五车间热处理工段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当前，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正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深入研究两千多年来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研究一下先秦时期奴隶们的起义斗争和儒法斗争的关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阶级斗争规律性的认识，还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社会大变革过程中，也只有奴隶们的阶级斗争，才是战胜奴隶制的决定性力量。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在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过程中，进行了英勇的斗争。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一时期的儒法斗争，正是在奴隶们起义斗争的推动和影响下进行的。

先秦时期的法家是怎样登上政治舞台的？法家是新兴

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代表，它最初是作为已经完全反动腐朽的处于没落时期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但是，反动腐朽的奴隶制决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场摧毁腐朽的奴隶制的阶级搏斗中，真正给予奴隶制以毁灭性打击的，是奴隶们的反抗斗争。自从商朝的奴隶们在牧野点燃了革命斗争的烽火，以后的起义和暴动风起云涌，连绵不断。从公元前五五〇年到公元前四七〇年的短短八十年中，就相继爆发了八次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平民斗争。从怠工到集体逃亡，从小规模的暴动到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不仅规模越来越大，斗争形式也越来越多。特别是柳下跖率领的“从卒九千人”的大规模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给予奴隶主统治以沉重打击，使当时的奴隶主贵族望风心惊，声势尤其浩大。在奴隶起义斗争的震撼下，一个个奴隶制国家土崩瓦解，一顶顶奴隶主贵族的王冠跌落下来，一块块井田遭到破坏。正是这种大小几十次的奴隶们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动摇和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就是凭借着奴隶起义造成的有利的阶级斗争形势和有利条件，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才得以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

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新兴地主阶级是这场革命的领导阶级，而在这场革命中起着主力军作用的始终是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充当起领导者的角色，也还是因为它所从事的地主阶级革命事业在客观上得到了奴隶们和

其他劳动人民的支持。新兴地主阶级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奴隶们的斗争。商鞅曾经明确提出过：“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这个“制民”，也包含有按照地主阶级的路线政策组织人民的意思。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时候，主要就采用了“以草茅之地，徠（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的政策，吸引了韩、赵、魏的大批劳动人民进入秦国，又“令故秦民事兵”，使之成为秦国实行耕战政策的重要力量。齐国的陈成子在向奴隶主贵族手中夺权的时候，为了“得齐民心”，争取奴隶和城市平民的支持，一方面用大斗出，小斗进，规定市上木料、鱼、盐的价格等办法，来获取城市平民的信任，另一方面又用私田招徕了大量逃亡的奴隶，使这两股力量皆“归于陈氏”，陈成子才得以从齐国国君手中夺得政权。这说明，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取政权的过程，是新兴阶级和没落阶级在阶级力量上进行激烈较量的过程。新兴地主阶级所以在阶级力量的对比上超过奴隶主贵族，主要是靠了奴隶们即人民群众的支持。

封建制战胜奴隶制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经历了好几百年。地主阶级在完成防止奴隶主复辟事业中，付出了几代人的努力，但最终完成彻底战胜奴隶主复辟势力的历史任务的决定力量，还是奴隶起义和农民革命。赵高政变这一复辟事件就充分证明了，地主阶级如果离开了农民和奴隶们的支持，是不可能独立地完成反对奴隶主复辟的事业的。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一个剥削制度代替另一个剥削制度的革命，这种革命的性质决定了他们

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做彻底镇压反革命的事情。同时，法家毕竟是剥削阶级的革命家，在他刚刚取得政权以后，便抛弃了曾经支持它夺取政权的人民群众，再也看不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因而总感到势孤力薄，当奴隶主复辟势力气焰嚣张的时候，他那种先天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就暴露出来了。赵高政变，对于已经获得人身自由的奴隶来说，就意味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对于广大农民来说，则同样面临着重新沦为奴隶的危险。这就决定了广大劳动人民是反复辟的最坚决、最勇敢的革命力量。如果说，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的话，那么秦末农民起义和奴隶起义则是粉碎奴隶制复辟的一次决定性战役，它对于巩固新兴的封建制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为什么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这一场大革命中，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会站在一条战线上来反对奴隶主贵族？这是因为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彻底腐朽没落了，除了奴隶主阶级以外的其他各个阶级都站到了奴隶制的对立面，迫切要求改造这种生产关系。所以在共同要求推翻奴隶制这一点上，使他们结成了联盟。但由于各自的阶级利益不同，参加革命的出发点不一样，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法家的进步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他们在不断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条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法家之所以能够起这样的进步作用，是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新生产关系的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还是生气

勃勃的真老虎，这个阶级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提出本阶级的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的阶级。但法家的这点进步作用，如果离开了广大奴隶们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斗争实践，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法家的政治路线是怎样产生的？归根到底，还是当时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反映。马克思指出：“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先秦法家能够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社会实践已经为之创造了物质条件。比如，法家提出“废井田”，是因为奴隶们的逃亡、起义、暴动早已同奴隶主贵族之间进行了一场“废井田”和“复井田”的斗争；法家提出“法后王”，是因为奴隶们早已把奴隶主“先王”的统治打得落花流水，并且也已经有了奴隶领袖柳下跖痛斥孔老二“法先王”的反动说教的革命事迹；法家提出“反天命”，是因为奴隶们早已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宣告了“天命论”的破产，如此等等。这一切说明，不仅法家路线的是否能够实行，取决于奴隶们的革命斗争实践；而且法家思想的形成，也在很大程度上受着奴隶们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影响。当然，当时的社会实践反映到法家的头脑中，便打上了地主阶级的烙印，成了地主阶级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和理论基础。

从法家思想政治路线产生和实现的过程来看，法家所起的进步作用，是离不开奴隶们创造历史的斗争实践的。当然，先秦法家提出的思想政治路线，促进了奴隶制向封建制

的过渡，但这决不能代替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作用。归根到底，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历史不是几个法家代表人物左右局势的历史，而是奴隶们的革命斗争决定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革命作用。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在研究先秦时期的儒法斗争的时候，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去考察，在肯定奴隶们推动历史前进的前提下，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这是对林彪鼓吹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的深刻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在儒法斗争史的研究中，作出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理论说明，从中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载《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

揭露“让步政策论”尊儒反法的本质

上海钟表元件厂三车间工人理论学习小组

随着批林批孔的深入发展，我们工人广泛开展了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历史的活动。在研究秦汉之际阶级斗争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一个问题：“让步政策论”者曾把实行法家路线的刘邦的政策，说成是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在正确评论法家进步性的同时，如何同反动的“让步政策论”划清界限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小组的同志翻阅了《史记》、《汉书》等历史材料，并且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了分析，编写了一个讲稿，在工人群众中多次进行宣讲。通过对西汉初期刘邦等人奉行的法家路线、政策的具体分析，揭露了反动的“让步政策论”尊儒反法的本质。

“让步政策论”的鼓吹者，把刘邦的“除秦苛法”说成是封建统治阶级向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一大根据。这是从儒家观点对历史真相的歪曲。

所谓“除秦苛法”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公元前二〇六年刘邦进入秦国首都咸阳后宣布的一项政策。刘邦在灞上

召集“父老”大会，宣告：“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汉书·高帝纪》）这就是刘邦“约法三章”和“除秦苛法”的由来。如果对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这一政策的内容作一番具体分析，就可明白它根本不是什么对农民的“让步政策”。秦末，新兴地主阶级和农民都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参加了推翻赵高、秦二世统治的斗争，粉碎了短命的赵高政变。在后期，刘邦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但他要推翻赵高、秦二世的统治，必然要以“全民利益代表者”的名义说话，所谓“父老苦秦苛法久矣”、“悉除去秦法”，只不过是这种姿态而已。刘邦的“约法三章”，实际上很明确地告诫人们不要反对和破坏他的地主阶级专政，这既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说的，也是对农民说的。刘邦为了扩大他地主阶级政权的基础，入关后，对主动投降的秦王子婴及关中地主阶级采取了保护政策，以取得关中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这里哪有什么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

“让步政策论”者闭着眼睛不承认“汉承秦制”的历史事实，只是抓住刘邦“除秦苛法”这句话加以歪曲解释。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正好是站在反对秦始皇实行法家路线，反对“焚书坑儒”这样一个儒家观点上，来看待所谓“除秦苛法”的。他们把秦始皇镇压奴隶主复辟活动的一切必要措施都叫“苛法”，并且把这些“苛法”说成都是对农民的，刘邦对农民“让步”，就除了秦始皇之法。但实际情况完全相反，刘

邦正是在继承秦始皇的法家路线和政策这一点上，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肖何进入咸阳后，“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肖相国世家》），汉朝的法律基本上是参照秦律制定的。刘邦指示肖何定《汉律》九章，基本上保持了《秦律》六章的面貌。《秦律》是秦始皇之法的主要内容，它是巩固封建制中央集权国家的有力手段，是贯彻法家路线、镇压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重要工具。秦始皇之法的主要锋芒是针对奴隶主阶级的复辟势力的，但它是地主阶级之法，也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刘邦令肖何对秦律“取其宜于时者”，显然包括了保护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势力、压迫农民阶级的内容。既然如此，那怎么可以把继承秦始皇之法的刘邦说成是对农民实行了“让步政策”呢？

“让步政策论”的鼓吹者，还曾提出刘邦的“轻徭薄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的又一证据。这同样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时候，接下来的是一个烂摊子。由于赵高的复辟活动，严重地破坏了封建经济基础。当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描绘的：“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这是一幅何等破败衰微的景象啊！“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将相或乘牛车。”“民无盖藏”，这就是说广大农民已经拿不出什么东西可供剥削的了。再说，连帝王都无力具备四匹纯一色的马来驾车，将相只能坐牛车，足见西汉王朝的财力物力在当时已空虚窘迫到了顶点。正是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刘邦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经济政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汉书·食货志》），就是其中之一。

“轻田租”是对农民的“让步”吗？根本不是。毛主席说：“封建的统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则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没有土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可见，对于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来说，是不会因“薄赋”而改变被剥削的经济地位的。当时真正得益的，首先是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刘邦在宣布“什五税一”的政策的同时，就规定了各地王侯、各级官吏的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各收其所赋税以自供”（《汉书·食货志》），就是说最终都得从农民身上榨取。这样兜了一个圈子，封建国家从地主阶级身上减去的那一部分税收，又通过加重对农民的榨取而重新得到了补偿。所以，“什五税一”政策的本质，是在地主阶级内部对剥削比例作一些调整，是处理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政策。既然农民的实际负担并没有因“轻田租”而减轻，怎么能说它是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呢？

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任何一个阶级发展经济，首先都是着眼于这一阶级的政治利益的。刘邦采取了许多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的措施，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巩固地主阶级政权，并不是为了农民。刘邦由于坚持了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这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其结果，只能是巩固了封

建经济基础，使地主阶级得到发展。这一点，连封建阶级的史学家荀悦也不得不承认：“务除租税，适足以资富强”（《前汉纪》卷八）。怎么可以把“以资富强”的地主阶级政策说成是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呢？

既然“让步政策论”不能成立，那么，“文景之治”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西汉初期的文帝刘恒、景帝刘启，相继执政近四十年，历史上号称“文景之治”。的确，这是汉代地主阶级政权相对稳定和生产发展的时期。《汉书·食货志》描绘了“文景之治”时的图景：“都鄙廩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这些话不能都信，但它多少表明在文景近四十年的统治期间，农业生产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国家积累了大量的粮食和钱财。这个局面是怎么来的？首要的条件是秦末农民起义给了奴隶制复辟势力以毁灭性的打击，从而为刘邦、吕后、刘恒、刘启推行法家路线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当然，文景二帝及法家贾谊、晁错坚持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巩固中央集权，重视农业生产，镇压搞复辟分裂的反动势力，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没有秦末的农民大起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其实，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来都明确地讲要专政，反对作为“让步政策论”思想基础的那些虚伪的“仁义道德”。从巩固地主阶级专政出发，他们也看到过某些阶级对立的现象。“文景之治”是地主阶级的“治世”，对于农民来说，日子仍然

痛苦贫穷。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晁错就说过，当时的农民虽然“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但却过着“卖田宅，鬻(卖)妻子，以偿债者”的悲惨生活(《资治通鉴》卷十五)。就连文帝、景帝也不得不供认“民有饥色”“民食颇寡”。这就足以证明，“文景之治”只能是建筑在农民血汗基础上的地主阶级的“盛世”。“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封建地主阶级的“天堂”是建筑在农民的脊梁骨上的。“文景之治”下的地主阶级是“官家之惠，优于三代”，农民则是“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哪里有什么“让步政策”呢！

西汉初期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历史证明，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是你死我活的两大对立阶级，谁也没有对谁让过一步。政策是有阶级性的，是一定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真有地主阶级统治者对农民的“让步政策”，那就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一笔勾销了。孔丘所谓“仁者爱人”，爱的只是奴隶主阶级，决不是奴隶或农民，也不是新兴地主阶级。儒家对镇压劳动人民是残酷无情的。“让步政策论”的炮制者却硬要编造对立阶级之间可以“让步”的鬼话。凭空编造这种莫须有的东西，就是要取消革命，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我们讲儒法斗争史，正是要批判这种反动观点，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剥开来看，“让步政策论”是一种尊儒反法论。“让步”者，“仁政”也，“德治”也，“礼让”也，完全是孔孟儒家商店里的货色。“让步政策论”者胡说刘邦是第一个实行了所谓“让步政策”的皇帝，实际上是把儒家“礼让”的帽子套到了法家头上，把法家的政治路线歪曲为儒家的“礼让”路线；“让步政策论”者把坚持法家路线的“文景之治”说成是“礼让”治国的样板，实际上是把法家的历史功绩偷偷地塞进了儒家的口袋。他们采取这种偷梁换柱的卑劣手法，可以达到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否定了法家的进步作用，又美化了儒家路线，更抹杀了劳动人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我们工人在实践中体会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重大意义。历史的经验证明：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为了达到他们的反动目的，经常要利用、歪曲和捏造历史。刘少奇、林彪都是“让步政策论”的支持者和鼓吹者，他们竭力推销“恕道”“仁爱”一类的孔孟黑货，鼓吹什么黑“修养”，其目的是要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要马克思主义向修正主义、孔孟之道“让步”，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向他们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让步”，最终是要“让”他们复辟资本主义，“让”我们广大工人、农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我们工人通过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所得出的结论是：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路线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因此，我们工人决不对任何反动阶级“让步”，决不在上

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对修正主义“让步”。我们要不断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不息，为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而战斗不息，为把批林批孔进行到底而战斗不息。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

“风庆”轮党支部

正当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前夕，我们“风庆”轮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在祖国人民和上海工人阶级的支持和关怀下，完成了历时一百五十天，往返三万二千哩，运载货物二万二千吨的远航任务，胜利地返回了上海港。

“风庆”号是我国自己设计制造，全部用国产设备装备起来的万吨级远洋货轮。它出厂后首次航行就跑地中海，途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穿越七个海峡，先后两次绕过好望角，四次通过赤道，全程等于绕地球赤道一圈半。象这样国产的万吨轮远航欧洲，在我国航运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风庆”轮全体同志，肩负党和阶级的嘱托，行驶这第一次，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这不是一次寻常的远航，而是一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战斗，是对我国人民自力更生能力的一次检阅。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但又充满信心。我们出航的船员虽然只有六十一个人，而“护航”的却是包括广大造船工人在内的亿万祖国人民。万吨轮载着

万颗心，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和力量。一路上，任凭风浪高，暗礁险，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风庆”号始终英姿飒爽，昂首向前。三万二千哩航行，是不平凡的三万二千哩，是中国人民扬眉吐气的三万二千哩，是大长无产阶级志气的三万二千哩。它鼓舞着一切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给了那一小撮反华小丑一次沉重的打击！它对于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之类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风庆”轮的胜利远航，为我国造船工业和远洋运输事业增添了光辉的一页。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是批林批孔运动的丰硕成果。

我们国家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起，就有了万吨级的远洋货轮。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制造这种远洋货轮的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单单上海就造了二十余艘。为什么国产船直到今天才远航地中海？是因为以前的船质量都不好吗？不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间，造船工人狠批刘少奇、林彪推行的崇洋媚外、投降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仅船越造越多，而且越造越好。许多船是完全具备远航条件的。那末，是不是我们的海员不想驾驶自己的国产船去远航呢？也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许多老海员尝过帝国主义压迫欺侮的味道，受过外国轮船资本家的气，日夜都盼望迅速发展自己的造船工业，那有一个爱国的船员不愿意驾驶国产的船跨洋过海！国产的万吨

轮所以没有及早远航，不是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存在着修正主义路线所造成的种种阻力。有那么一些人，满脑子崇洋迷外，他们迷信外国的船，而对于国产的船总是百般挑剔，说这也不行，那也不灵。他们散布种种怪论调，说“国产船只能跑近海，不好跑远洋”，说“国产的万匹机不可靠”。有些人甚至作出荒谬的结论：外国机的质量有毛病是偶然的，国产机的质量出毛病是必然的。因此，明明可以航行到世界各个港口的国产万吨轮，却一艘艘被卡住不能去远航。今年年初，人们对于这种状况再也忍耐不下去了，终于爆发了一场大争论。这艘万吨轮经过三百个小时的试航，证明主机、船体、导航仪器、水密装置以及舵机的性能都可靠。可是，有些人却偏偏扭住某些问题进行多方刁难，致使交船的日期一再拖延。江南造船厂的工人首先对这个问题贴出大字报，尖锐地指出：不是船有问题，而是某些人的脑子有问题；表面上是技术问题上的争论，实际上反映了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一炮轰得好，轰得大快人心。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广大海员工人和造船工人并肩作战，批判了林彪投降卖国、复辟倒退的罪行和崇洋媚外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船的船员同“国产船不能远航”的怪论进行了斗争，贴出了一张题为《我们要革命，“风庆”要远航》的大字报。许多船员说：路是人走出来的，第一条航线也是人开辟出来的，国产船远航我们一定要实现。有些人议论讥笑我们，说我们要驾驶“风庆”号去远航是想出风头，“风庆”号要改名为“风头”号。船员们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们不出个人

的风头，我们是为自己的阶级争气！万吨轮、万匹机的制造成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我们争国产船的远航权，是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保卫社会主义新生事物。那怕前面有千层恶浪，我们驾驶“风庆”轮远航的决心是下定了的。

“风庆”轮的远航，正象广大造船工人和船员说的，是批出来的，是斗出来的。没有批林批孔的革命群众运动，就没有这一次远航。这件事，使我们又一次体会到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的重要性。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形形色色的崇洋迷外思想就会抬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就得不到很好贯彻；抓了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革命，把资产阶级歪风压下去，无产阶级正气得到发扬，革命精神大振，好多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也就办到了，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就加快前进了。“风庆”轮远航的胜利，正是批林批孔这一场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伟大战斗中出现的必然结果。

有些人总是瞧不起国产的东西。这次“风庆”轮远航，有人就曾经散布说，“风庆”轮可以远航，不过要把船上的雷达、电罗经等五件国产的仪器设备换成进口的。革命的海员工人和上海产业工人一起，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说换吗？可以！船上还有测向仪、超高频无线电话和尼龙缆绳这三件是进口货，要换上国产的。我们要全部用上自己国产的东西！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我们主张排外吗？当然不是。我们并不是一概拒绝外国的东西。船上用一点外国

的东西也不是不可以。外国的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都要加以研究,作为借鉴。问题是立足点放在什么地方。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这里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换”,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掉,一个要把国产的东西换上,这不单纯是技术业务问题,而是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感情、世界观,是要不要坚持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里,对自己国产的东西没有感情,这也不称心,那也不放心,那就连爱国主义也丢了,更不用说马克思主义了。一艘万吨级的货轮,好比一个流动工业展览会,反映着国家工业发展的水平。世界上能造万吨轮的国家,一艘船里全部用国产装备的也不多。有的只造一只船壳,舵机、主机、辅机、导航设备等,往往是用几个国家的产品装配起来的。我们的“风庆”轮,从机器设备到船员的生活设施,全部是国产的,这一事实充分说明我们国家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二十五年的艰苦奋斗,工业生产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这次“风庆”轮航行三万二千哩,停靠八个国家的港口,每到一处,人们问起我们船的一切,我们总是扬眉吐气地回答,都是中国造的,都是我们国产的东西!当我们向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取得的胜利而喜悦,为祖国的日益富强而自豪!

有的人也许会说,他不是不喜欢国产的东西,而是担心它的质量不可靠。一艘远洋轮,跨重洋,过大海,要经过无

数惊涛骇浪，航行设备的质量当然不能忽视。但是，对质量问题，不同的立场也会有不同的回答。产品不使用，就实现不了使用价值，质量是高是低也无从考核。在使用中提高，在使用中完善，生产的发展过程从来就是如此。不是十全十美就拒绝使用，那就会把一种产品扼杀。产品质量的完善总是有一个过程的。翻开世界造船和船用柴油机的历史，从制造二十五匹马力的船用柴油机到比较稳定可靠的万匹机，资本主义国家就花了整整七十年。难道现在他们的产品就那么十全十美了吗？我们船的一位船长就有过亲身的经历。一九七二年，他先后驾驶过两艘从国外买来的远洋轮，都出过重大事故，分别在海上漂了八个小时之多，而损坏的主机正是所谓信得过的“名牌货”。我们的远洋轮的质量怎样？事实是最好的见证。这一次的三万二千浬航程，从北半球到南半球，又从南半球到北半球，珊瑚礁密集的地区，波涛汹涌的海峡，狭窄的港湾，都经历过了。好望角，人们称之为“天无三日晴，海无三日宁，好望不好过”的地方，我们的船两次安全通过。一次风达八级，浪高四米，有条外国船高挂黑球两只，表示已经失去控制能力，而我们“风庆”轮却笑迎狂风黑浪，胜似闲庭信步。整个航程，主机运转了二千三百小时，在南非两岸先后两次连续运转十六天以上，性能很好。一路上，经受了春夏秋冬四季，大风、巨浪、迷雾、暴雨、低气压等各种气候条件的考验。有人不是信不过我们国产的雷达、电罗经、发报机等五大件吗？事实上，正是这些国产的设备，保证了我们的万吨轮安全航行。我们

年轻的造船工业和船用设备配套工业，尽管还有这样那样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远洋轮已经具备远航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了。提高远洋轮的质量，不光是造船工人的事，我们海员工人也要负起自己的责任。经过一次远航，我们积累了一些资料，为建设海上铁路取得了一些经验；不断地远航，就可以不断地积累资料，我们的远洋轮也就可以不断地完善。造船工人和海员共同努力，我们的造船工业和航海事业必将更加迅猛地发展。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群众振奋起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象大洋的水，载得起千条万条船，力量大无边。“风庆”轮这次远航，是在批林批孔的革命高潮中开始的。通过批林批孔，提高了海员们的阶级觉悟和路线觉悟，激发了大家的革命责任感。出航前，大家一边搞革命大批判，一边紧张地开展学习掌握新船性能的活动，做到技术上精益求精。船员说：造船工人为祖国造出这样好的争气机、争气船，我们一定要做争气人，开好争气船。全程三万二千浬，无论到那个港口，我们的船外面漂漂亮亮，里面清清爽爽，外国朋友称赞我们，海外侨胞夸奖我们，都说我们的船不仅质量好，而且保养得也好。有的外国人到机舱参观，看到那么整洁，惊讶地说：“啊，这里简直可以供我们跳舞。”若问我们船员的责任感究竟怎样，只要举一举货物保养这件事就够了。我们这一次去的时候，运往罗马尼亚的是一万一千吨大米。大米，是货物中比较“娇”的东西。放在货舱里两个月，经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气候变化。两次经过赤道，大舱气温高达

四十度。海上遇大风，巨浪淹没甲板，冲刷着整个舱盖。为了使大米不受损失，大副带领护粮小组的船员，不管是寒冷的冬天还是闷热的夏日，始终每天三五次地检查货舱，使舱温、米温和空气的湿度保持适当。从上海到康斯坦萨港的近两个月时间，米温始终没有超过三十度。到了罗马尼亚，一万一千吨大米，无霉无蛀，完好无损，受到罗马尼亚人民的好评。从上海到罗马尼亚，又从罗马尼亚回上海，历时一百五十天，举船上下，团结战斗。全体船员一路上写诗写文，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风庆”轮远航三万二千哩，扬眉吐气地回来了。有的同志说，这次是光荣地开出去，胜利地开回来。我们说，正是这样。不过，还得加上几个字：是斗争中光荣地开出去，斗争中胜利地开回来，斗争并没有结束。“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既然是长期的方针，坚持这个方针，反对崇洋迷外，也是长期的斗争任务。崇洋迷外的思想是帝国主义长期侵略我国留下来的破烂货，只要社会中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种思想总会一再冒出来。彻底地扫除这些垃圾是需要时间的，不能指望经过几个回合的战斗就完全解决问题。

不过，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终究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风庆”轮远航的前前后后，种种扣人心弦的事迹，使我们更加强烈地感

觉到这一点。这艘船和船上的设备是经过上海和全国五百多个协作单位造出来的。这些单位的工人用的是怎样的精神呢？造船体和主机的是江南造船厂。他们造的第一台主机，是在船体车间旁边的一个空地上，搭起芦席棚安装的。为了保证主机的质量，下雨时，工人用自己的衣服盖在机器上，免受损坏；天热时，工人整天在机器旁观察阳光直射带来的影响。他们艰苦奋斗，用自己的汗水浇出高质量的争气机。船上的尼龙缆绳是一家二百五十人的弄堂小厂——红卫绳带厂造的。厂房低矮，场地狭小，工人们挖地六尺，装起自己设计的机器，造出高质量的争气绳。在我们准备远航的期间，也不知道有多少协作厂的工人上船来，帮助我们熟悉各种新设备的性能，为我们提供必要的备品备件，千叮咛万嘱咐，祝我们远航胜利。所有这一切，说明我们中国的工人有着坚定的信念，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把祖国建设成为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海外，我们遇到过不少侨胞，他们以热切的目光望着我们的“风庆”轮，有的把上一次甲板比作踏上一次自己的国土而感到高兴。毛里求斯有一位老华侨，有子女九人，“风庆”轮一靠岸，就扶老携幼上船来参观。老人从船头到船尾，从驾驶台到机舱，细细看，轻轻摸，看到样样是国产品，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华侨的报纸以最醒目的标题发表文章和消息，介绍这艘国产的万吨轮。我们离港时，侨胞们赶来不断地招手，含着热泪高声地喊着：“祖国的船，不断地来啊！”这种动人的场面说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加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步

伐,不仅是国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共同意志,也是海外千千万万爱国侨胞的共同愿望。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都热烈地希望我们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下取得更大成就,以更好地完成我们担负的光荣的国际主义义务。

“风庆”轮的第一次远航结束了。但是,革命在发展,斗争在继续。我们要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乘长风,破万里浪,不断奔向胜利的前方!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

搞生产一定要 抓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

中共上海第二焊接厂支部委员会

我们厂是一个二百多人的小厂，几年来，厂的规模没有扩大，人员没有增加，仗越打越大，生产任务越来越重。一个小厂，几台旧车床，为什么能够挑重担？敢于挑重担？有的同志参观了我们厂以后，问我们这股子劲头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体会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锻炼的工人群众，路线斗争觉悟更高了，社会主义积极性更加焕发了，创造性和智慧更加丰富了。看到这一点还是看不到这一点，大不一样。坚持抓路线，讲团结，把这种积极性好好组织起来，我们就力量无穷，无往不胜；忽视这种积极性，我们只能赤手空拳，一事无成。

年初，上级准备把原来分散在造船厂等五个单位生产的小化肥设备碳化塔的任务，集中到一个单位生产。我们厂的工人主动要求接下来。有人想，过去我们生产碳化塔，每台需要五千个工时，后来改造土设备，从五千工时缩短到二千九，再缩短到一千五、八百、七百个工时，已经弄得很吃

力，现在要把五副担子弄来一肩挑，这不是自讨苦吃吗！可是工人群众说，我们多挑一些担子，造船厂就可以多造万吨船，化肥厂就可以多产化肥，让贫下中农多打粮。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战略方针的大好事，怎么说是“自讨苦吃”呢！五副担子一肩挑，我们挑定了！这样，我们就接下了一百台碳化塔的全部任务。

市里组织某项工程会战的时候，需要一种机器。这在我国还是一项空白。据外国资本家说，他们搞了十几年，试验了一二百次才搞成功。我们自己能不能造？在有关单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争论得很激烈。当时我们厂参加会议的同志想：这项任务一无图纸，二无资料，三无样机，说难吧，确实是难。接不接？一时下不了决心。同去的工人同志却说，我们工人坚决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这场争气仗我们一定要打！于是我们向上级要下了这项任务。

今年四月初，我们去某重点建设工程工地学习参观。在工地上，听说他们有一项主要设备钉头管的焊接任务。因为工作量大，时间紧，还没有落实，他们正在焦急。这项任务，要在象热水瓶那样粗的管子上焊接三千二百多只钉头，总共要焊九十二万只，而且要求在三个月内完成。我们算了一下，即使有一台普通碰焊机，一分钟焊一只，也要一年半时间。有的同志说，我们是来参观，又不是来接任务的。可是大多数工人说，这项工程是上海的一项重点工程，工地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时间再紧，任务再重，我们也要

担负起来。于是，我们又把这项任务争了回来。

就这样，我们厂的工人接来了、争来了一批又一批重的、难的、急的任务。我们是憋着一肚子对帝、修、反的气接下来的，是怀着满腔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决心接下来的。

对于这些重的、难的、急的任务，工人们是怎么看的呢？他们说：任务重，正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快；技术难，正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面貌新。大家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国家建设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任务！”

要讲物质条件，我们没有一间象样的厂房，有的产品高达十几米，而我们最高的一个车间也只有五米高；全厂总面积只有七亩地大，有时一批产品铺下来就要占地七十亩；我们的设备，几年来工人群众自力更生造了一些，但还不适应加工这些重点产品的需要。我们接下这些重点任务，上级是支持我们增加一点设备、多花一点资金的。可是，工人同志说：“越是重点，越不能等、靠、要；越是困难，越要干、闯、造！”

凭着这种革命志气，全厂不分工种，不分小组，不分前方后方，大家一个心眼儿上。战斗最紧张的时候，许多人干了日班连夜班，干了夜班连早班。有些同志病了，把病假条往袋里一塞，仍坚持干下去。金工烧电焊，木工做冷作，驾驶员当搬运工，连食堂的同志也拿起了漆刷子。科室人员组织突击队到第一线，随时为工人服务。工人们说：大干快干多贡献，艰苦奋斗心里甜。

凭着这种革命志气，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

件上。工人们学习了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分析碰到的困难。他们说，困难是可以转化的。在一定条件下，难可以转化为不难。没有铸件，我们就来个“以己之长，攻彼之短”，用焊接件来代替；没有大设备，我们就来个“蚂蚁啃骨头”，用小设备围攻大家伙；那个工种任务紧张，我们就打破分工界限，搞“一专多能”。现在，全厂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掌握两个工种的技术，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可以掌握三四个以至五六个工种的技术。靠艰苦奋斗的革命干劲，我们挑起了重担，靠这样的革命转化法，我们苦干加巧干，把一个又一个重的、难的、急的任务完成了，而且把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促了上去。今年以来，我们已经搞成功革新项目二十七项，工效最低的可以提高两倍，最高的可以提高十四倍。工人们高兴地说：活越干越巧，仗越打越精，路越走越宽。

抓生产，首先要抓路线，抓思想，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近几年来，认真看书学习的空气，在我们厂里是比较浓厚的。我们全厂工人和干部绝大多数已经读过五本马列的书，在一九七二年以前进厂的同志中间，百分之九十五的同志已经通读过《毛泽东选集》四卷。厂里学哲学中心组成立到现在，每周坚持学习一次，已经坚持了四年多。工人群众掌握了革命理论，思想境界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自觉地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同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我们今年在三次生产会战中,就进行了三次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的斗争。

第一次是在年初订计划指标的时候。当时冒出了一种“艰苦奋斗要到哪一年”的思想。有的干部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年来,增产幅度很大,年年要打几次会战,今年又要大幅度增产,到底要会战到哪一年?针对这种思想,工人群众深入批判了林彪、孔老二搞复辟、搞倒退的罪行。大家说,我们要坚持革命,继续前进,就要艰苦奋斗。有一个青年工人在大会上响亮地说:“若问艰苦奋斗到哪一年?要到共产主义来实现!”他说出了全厂工人的心里话,全场热烈鼓掌。这次思想斗争,促进了艰苦奋斗精神的进一步大发扬,订出了今年增产百分之二十的计划,掀起了技术革新的高潮。

第二次思想斗争是在年中。我们厂今年计划任务是三千二百到三千五百吨。由于大搞技术革新见了效,到六月份,赶制一批大口径水管,光这一项就完成了三千六百吨。当时在少数人中有“松口气,歇一歇”的思想。工人群众提出,这批任务加工比较简单,不能算三千六百吨。有人认为,已经稳稳当当到手的全年完成数字,为什么不能算?工人群众说,我们不能只看见已经完成的数字,更要看到摆在前面的担子,干社会主义,对自己就要高标准严要求,就要有不断革命、跃进再跃进的雄心壮志,破除“舒舒服服闹革命”的懦夫懒汉世界观。一场思想交锋,统一了认识。我们统计表报上的数字降低了,艰苦奋斗挑重担的思想却进一

步发扬起来了。

第三次思想斗争是在九月初。由于国家建设发展的需要，我们厂今年九月到十二月的生产任务，比前八个月要增长百分之三十一。还要腾出人力参加某重点建设工程。这时候，厂里又产生了消极畏难思想。有人认为，要完成这样繁重的任务，我们设备不够，人员不够，厂房场地不够。当时，大家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批判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工人同志们联系实际，批判林彪畏敌如虎，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右倾机会主义，进一步焕发了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

第三次思想斗争，为第三次生产会战开辟了胜利局面。我们的生产会战，打的是思想仗，在战斗中把工人阶级的队伍锻炼得更坚强。

几年来，我们领导班子成员，坚持同群众一起学习、一起劳动、一起战斗，在共同战斗中向群众学习。工人群众艰苦奋斗的精神始终教育着我们，鼓舞着我们。我们领导班子成员中，大多数同志是捏电焊枪出身，在本厂当过学徒的。这是我们联系群众的有利条件。但是如果弄得不好，自以为有群众基础，不再虚心向群众学习，那有利条件也会转向反面，会逐步丢掉工人阶级的本色。我们党支部和革委会十个成员，除了五个不脱产的以外，其他五个人每年劳动都在一百天以上。象我厂革委会副主任老张，年纪大，身体有病，但他坚持同群众一起战斗。会战最紧张的时候，他寸步不离现场，一面参加生产，一面指挥生产。大家越干精

神越焕发,越干越有劲。

生产越忙,任务越重,越要抓路线,抓思想。群众起来了,干劲越高,领导越要关心群众生活。会战紧张的时候,群众干劲很高,我们就注意安排群众好好休息。哪些同志身体不好,需要照顾;哪些同志住在厂里没有被子,我们心里都有一本账,及时通知后勤部门作好准备。我们关心群众,群众更关心我们,我们动员群众去休息,他们硬是挤出铺位来,一定要我们去睡,使我们感到很温暖。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几年来的团结战斗,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只要我们把路线搞对头,任何时候都同群众紧密地站在一起,那就任何重担都敢于挑;当一种错误思想露头的时候,领导班子也脚踏实地,比较容易顶得住。因此,我们一直实践着这样一个口号,叫做“领导的心要同群众的脉搏跳动在一起”。

(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

——上海中国电工厂的调查报告

上海市仪表电讯工业局调查组

上海中国电工厂是一个专业生产漆包线的工厂。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没有要国家投资，没有靠建新厂房和向国家要新设备，而是立足于现有基础，自己动手，开展技术革新，在全国二十多个兄弟工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协作下，今年三月份以来，自己设计、制造出十五台催化燃烧漆包机，将原有的漆包车间改造成为全部采用新技术、新设备的新车间。催化燃烧漆包，在国外是六十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新技术。这个厂制造的新设备，有多层、多线轴、高速的特点，符合多快好省的要求。新车间投产后，可使漆包线的产量，在比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增长三倍的基础上再增长一倍，质量进一步提高，并节约用电百分之六十以上。采用新技术后，漆包线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有害气体也可回收燃烧，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三废处理

问题。过去有人曾计算过，单设计一台新式漆包机，需要半年，如果改造一个车间，至少要三、四年。而这个厂只花了半年时间，就把新车间建立起来了。它说明，毛主席制定的自力更生的伟大方针，最能解放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最能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广大群众掌握了自力更生的方针，就会在技术革新中迅速改变生产技术面貌，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来。

批林批孔 长自力更生的志气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这场上层建筑领域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多快好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批判和清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树立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是开展技术革新的强大动力。

漆包线是机电、仪表等工业不可缺少的材料，被称为“电机的血管”、“仪表的神经”。原来的漆包机，是在铜线上涂绝缘漆，再用电热烘干，耗电量大，是有名的“电老虎”。烘干时，溶剂中的苯、酚等有害气体大量散发，污染环境。过去，广大工人也曾要求改革技术，试验和制造催化燃烧新技术、新设备，可是，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下，只靠少数技术专家关门查文献资料，计算数据，一无结果。文化大革命以来，随着我国工业生产和科研事业的迅猛发展，不仅对漆包线的需求量大大增加，而且对质量、品种提出许多新

的要求。但是，产量、品种上去了，耗电量也大量增加，有害废气增多，成了生产发展中的尖锐矛盾。批林整风运动中，广大工人批判了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提出要把过去没有搞成的催化燃烧漆包新技术攻下来，并且组织了一个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试验小组。开始，有的人不相信工人能够造出先进的漆包机，热衷于要从国外进口设备。厂里有的领导干部也担心，这种新技术很复杂，能不能攻得下来。还认为，文化大革命后生产已翻了几番，达到了先进水平，眼前还过得去，因此没有放手发动群众，技术革新进展不快。

广大群众要求革新技术，但洋奴哲学的修正主义影响造成了严重的阻力；安于现状，无所作为的思想又束缚了群众的手脚。只有用自力更生的思想武装群众，才能使他们看到自己的力量，打碎各种精神枷锁。批林批孔运动开展后，广大工人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进一步认清林彪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反动实质，大大提高了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他们听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封锁、垄断新技术，而且还用高价、专利权卡我们，进口一台催化燃烧漆包机的价格，就等于这个厂固定资产的一半。大家憋着一肚子气，坚决表示，中国工人阶级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自力更生，开展技术革新，造出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的“争气机”。他们在学习和批判中，还回顾这个厂的发展史，总结坚持自力更生方针所取得的成就，把洋奴哲学批得无处藏身。这个厂原是由十

七个小厂合并起来的。起初，生产漆包线全靠手工操作。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工人们第一次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跳出仿造外国设备的框框，造出一百二十一台成套的简易拉丝机、漆包机，工人叫它“跃进机”，还编了一首顺口溜：“走进电工厂，遍地土设备，大的象楼房，小的桌上放，配套又成龙，土法显威风。”工人说：“过去我们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改变了生产的落后面貌；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路线斗争觉悟提高了，物质条件改善了，更应该坚持自力更生的方针，掌握最新技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大家总结出一条基本经验：满足现状，畏难保守，迷信洋人，搞爬行主义，就会灭我们工人阶级的志气；只有自己动手，用新技术、新设备武装自己，才能大长工人阶级的志气。通过学习、批判，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大大发扬，搞技术革新的信心越来越足。

敢闯敢创 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任何新技术，都是在生产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对于它的发展规律，也只有依靠我们自己的实践，才能认识它，掌握它。敢不敢闯，敢不敢创？这是能不能把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到技术革新活动中，发挥出巨大威力的一个重要问题。

催化燃烧漆包机，包括催化燃烧和热风循环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部分，即通过催化剂使绝缘漆中蒸发出来的大量

有机溶剂加快燃烧，同时把燃烧时产生的巨大热量通过循环系统来烘干漆包线。这样既可以节约用电，又可以通过燃烧把有害气体变成无害的水和二氧化碳，避免污染。但怎样催化，怎样燃烧？燃烧后又怎样把热量收集起来，重新送到漆包烘炉里，生产出高质量的漆包线？这中间有一系列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一些不相信自己的力量、有盲目崇洋思想的人，被这一系列的难题难住了，动也不敢动。可是，中国电工厂的工人认为：催化燃烧技术规律既然是客观存在，只要敢于去碰它，反复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总是可以掌握的。工人们从搞小样开始，再搞模拟试验，先后经过八十六次试验，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剥去了这门新技术的神秘外衣。例如，催化燃烧区是催化燃烧漆包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搞模拟试验时，催化区烧了一会就不烧了，有害气体从出口处冒了出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开始，他们用鼓风机把出口封住，想把冒出来的烟压回去，可是越压，烟冒得越厉害。工人们毫不气馁，总结经验再干，他们从毛主席著作中找到了打开催化燃烧秘密的钥匙。毛主席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这个辩证思想启发了工人。要不冒烟，不能压，而要“放”。燃烧是氧化反应，要有新鲜空气。他们撤掉了出口的鼓风机，并加大了进口鼓风机的风量，催化区的新鲜空气多了，反应充分了，越烧越旺，有害气体基本上都烧掉了，就自然不冒烟了。这个厂的工人就是这样通过实践、认识、再

实践、再认识，终于逐步掌握了这项新技术。

国外有先进技术，我们也有先进技术。发展新技术，要从我们的生产实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出中国式的新技术、新设备，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电工厂试制催化燃烧漆包机，开始是两层烘箱、十六个线轴，生产效率还不高。而这个厂在大跃进中创制的电热漆包机，有七层烘箱、五六十个线轴，效率较高。能不能把现在掌握的催化燃烧新技术和过去自己创造的多层、多线轴、高速的先进技术结合起来，制造出有七层烘箱、五十个线轴的催化燃烧漆包机呢？当时，有人吹冷风，说这种漆包机国外还没有，要想造这种技术更复杂、要求更高的机器，简直是空想。工人们回答：国外有的，我们要有；国外没有的，我们也要有，这才叫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根据工人群众的建议，党总支召开了有几十位工人、干部、技术人员参加的“诸葛亮会议”，一连开了三天三夜，讨论技术方案。会上，七嘴八舌，献计献策。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发挥出来了，一个个技术难题解决了，这种催化燃烧漆包机也就造出来了。目前，国外一种被称为先进的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结构非常复杂，形态也很笨重，工人笑它是“笨头笨脑，张牙舞爪”。中国电工厂的工人走的是另一条路。他们使用了新的冷却方法，大大简化了机器结构，只使用五个电动机，三个鼓风机，四个阀门。如果按照国外的设计、用料，仿造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需要二、三十万元，而中国电工厂制造的同样一台机器只要四万多元，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

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还要立足于本国的资源条件。催化燃烧漆包机的一种关键材料，是催化剂。国外采用白金和其它贵金属，价格昂贵。如果采用这种催化剂，就是整个设备搞成功了，也难以推广。这个厂的工人决心把自力更生的精神贯彻到底，不搞半截子革命。他们到处访问求教，进行各种试验，找到一种新的担体催化剂，这种催化剂我国资源丰富，价格很低。在用料方面，工人们也打破洋框框。为了适应高温，国外制造这种设备都用不锈钢材。中国电工厂工人经过测定分析，除在催化区使用不锈钢材外，其他部件都用普通钢材，仍然可以达到技术要求，使不锈钢材的用量只及国外的六分之一到八分之一，为推广这种新技术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事例说明，广大工人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聪明才智，自力更生的方针打开了这个丰富的宝藏，就使他们的智慧放出更大的光彩。

争取时间 使技术革新之花迅速结果

通过批林批孔，自力更生方针更加深入人心，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越来越高，技术革新活动也就热气腾腾，进展迅速。原来，这个厂的领导计划今年国庆节前试制出新的催化燃烧漆包机，明年再逐步推广。可是，群众一经发动起来，坚决要求大干、快上，把技术革新成果早日用于生产，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他们说：争气就要争在时间上。我们不仅要造出几台样机，而且要用新技术、新设备，改变

整个车间的面貌。

“批了林彪和孔丘，革命干劲估不透”。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有十吨重，四层楼房高，仅制造就需要一千六百多人工。改造漆包车间，要把原来十二台老设备拆掉，换上十五台新设备，需要二、三万个人工。而整个机修部门能够投入的人力只有八十多人，一年也干不完。设备、场地等方面也都存在很多困难。可是，用自力更生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工人，有大无畏的革命气概，迎着困难上。担任设计绘图的原来是个钣金工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他认识到造的是“争气机”，打的是政治仗，为了争时间，抢速度，主动到现场去，和工人们一起商量，在大家帮助下，只用了二十多天时间，就画好了平常需要四个月才能画好的全部图纸。制造设备没有场地，工人们在车间外面的走廊、过道里，用油布搭起十几处临时工作棚，到处摆开了战场。劳动力不足，各车间主动抽出生产工人支援，并且打破工种界限，人人学做多面手，钣金工人能做电焊工，研磨工人能做车工，连泥木工也上了机床。生产工人下班后也纷纷参加义务劳动，全厂几乎每个人都为技术革新出了一把力。设备能力不足，工人们简易上马，想出许多穷办法、巧办法。批林批孔运动以来，他们接连打了三仗，一次比一次打得漂亮。第一仗，以四十七天时间，造出一台卧式七层烘箱的催化燃烧漆包机；第二仗，八天八夜，造出了一台立式催化燃烧漆包机；第三仗，又以三个多月时间，建设成功一个用新技术武装起来的新车间，使生产技术面貌焕然一新。九月底，大部分新设备开

动起来了,不仅把脱下的任务补上,完成了九月份的生产任务,而且比原计划提高了百分之五十。

毛主席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从中国电工厂自力更生发展新技术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只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就能把生产技术不断推向更高的水平,完成和超额完成国家计划,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十一期)

万匹机的诞生

赵 传 功

我国自己制造的万吨巨轮已经乘长风破万里浪，涉重洋远航四方。万吨轮航行要靠万匹机带动。万匹马力柴油机体积大，运转时间长，机件精度要求高，造起来很不容易。那末，我国的造船工人是怎样解决一个个技术难关，造出一台台万匹机的呢？从江南造船厂、上海船厂、沪东造船厂这三个厂的情况看，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万匹机生产，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经验。

大曲轴是怎样加工出来的

万匹机体积很大。大就有大的难处。万匹机的一些大部件比一台小柴油机还大，当时各船厂缺少加工这样大部件的设备。这就遇到了困难。有人主张等具备了大机床再干。广大造船工人说：“愈等人愈懒，愈等志愈短”。他们决心闯一条用普通车床造大部件的路子。这条路子能不能闯出来，大曲轴是个关键。它重达六十吨，是万匹机最大和最

重要的部件,要是它不能加工,其他部件加工出来也造不成万匹机。

加工大曲轴首先是车床尺度不够。曲轴加工时的旋转直径2.2米,而刀架与车床爪盘中心的最大距离只有0.9米。这么大的曲轴装上去,刀架就没地方装了。怎么办呢?工人同志在旁边加一块平板来扩大床身,把刀架装在平板上,加工宽度就解决了。但是,照顾了加工宽度却影响了加工长度。刀架原来是装在车床的导轨上,可以把工件从头车到尾。现在它逾“轨”而出,装到平板上,就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只能固定车一点。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工人同志就在大刀架上装了个可以小范围自由活动的小刀架,大架静,小架动,从车一点变成车一段。但仍不能整个车完。曲轴全长有9米多,是很长,但长是由短组成的。曲轴实际叫曲拐轴,由六个凸状连接而成。凸处为拐,接连处为轴。精加工时要车其轴,避其拐。一条长轴就被六个拐断成七个短轴颈,可以分成七档加工,这样,每一档的加工长度就不长了。小刀架的走刀范围虽小,却足可以车完一档轴颈。之后,小架停,大架动,用行车移到第二档、第三档……就可以化长为短,积短为长,解决了加工长度的困难。

在加工尺度扩大之后,由于打破了刀、床原来的对应关系,车床加工精度也由此失去了保证。工人同志又充分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把每次切削量减少,整个切削次数增多,通过切一测一再切一再测……逐步向高精度逼进,用过细的操作来弥补机床性能上的缺陷,保证了曲轴加工的精度

要求。

加工大曲轴的精度还要求七个短轴的轴心都在一条直线上。这个要求，在车床上进行测量时，常常比较容易达到。但在离开车床之后，曲轴的七个轴心，就又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偏离。原来，这种曲轴原形本来就不太直，七段轴颈不“同心”。但加工时，曲轴是套在三个中心架上，这三个中心架又固定在同一条中心线上，所以，曲轴上了中心架不直也被强行扳直了。不同心变成假同心。金属有弹性，“能屈能伸”，强行扳直掩盖了矛盾，一旦离开中心架，直的又变成弯的，掩盖的矛盾又暴露出来。尽管这种现象出现较少，偏离程度也很小，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极其微小的偏离也会使大曲轴的精度受到很大影响。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工人同志用几个V型木枕在下面把曲轴托住，木枕可以自由滑动，曲轴在旋转过程中就可以使原形充分伸展，把矛盾暴露出来，就使七段轴颈也从假同心变成真同心了。

大曲轴在车床上成型之后，要和其他部件装配起来，这是最后一道工序。由于装配的精密度要求很高，一般需要在室内进行。当时没有这样大的万匹机安装车间，就因陋就简在露天场地安装。这样每个部件都要受到阳光辐射热的影响，热胀冷缩使之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形。变形掩盖了原形，假象掩盖了本质。安装需要根据各种测量数据进行，由于热胀冷缩的变化，测量数据就千差万别，大曲轴就摆不正，装配其他部件也就矛盾百出。面临着这个困难，是停下来，还是干下去？工人同志进行了研究和观察，发现温度的

变化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寻的。“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表现在静止中”。（《反杜林论》）温度变化也同任何物质运动一样，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也有相对不变的一面。安装万匹机的场地尽管昼夜温度变化很大，但不平衡中有平衡，变温中有恒温，他们通过实测发现深夜零时到次日凌晨，地面旧辐射热基本上散发了，新的辐射热还没产生，温度处于相对平稳的过渡状态。于是他们就抓住这个时机进行测量、安装，从而保证了精度要求，克服了工艺过程中的又一道难关。

活塞环寿命是怎样延长的

万吨轮不但装货多而且航程远，这样，万匹机连续运转的时间就长了，它的耐磨性能要求也比小柴油机高。万匹机运转时互相磨损的部位很多，作为衡量其耐磨质量的主要标准则是活塞环的工作寿命。活塞环是装在活塞上的五道金属圆环，与气缸壁紧密贴合，防止漏气，当它磨到失去这种作用时，就要停航，拆缸，调环。因此活塞环不耐磨，寿命短，就不能远航。国外有些虽已生产了好多年的产品，活塞环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剧烈磨损。上海造船工人开始造万匹机时，这个矛盾也很突出，起初造的活塞环寿命只有一百多小时，离使用要求相差很远，成为急待改进的大问题。

要延长活塞环的寿命，就要解决气缸温度太高的问题。高温会促使环壁变形，从而引起磨损。同时，高温又使环、壁

间的润滑油变稀，也使磨损加剧。这是影响活塞环寿命的原因之一。

高温造成的矛盾，要通过降温来解决。降温就要减少燃烧室的油量。但油量一少，活塞运动的动力小了，万匹机功率也要下降。怎么办？工人同志经过研究认为：活塞环工作表面的冷热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燃烧室的温度。活塞环内靠活塞体，外贴气缸壁。活塞体并不是实打实的一尊钢柱，气缸壁也不是死板板的一块铁板，它们内部都有流动冷却水的通路。所以，它们既有受热的一面，还有散热的一面。受热与散热的矛盾变化决定着活塞环工作表面的温度变化。燃烧室的火势不能退，活塞体与气缸壁的冷却水量却可以变。缸套上部原先只有一个冷却水出口，进水多，出口小，水流不畅，影响散热效果。当把一个出口扩大成两个，又在气缸内加了个导流罩，整个冷却水流量分布合理，散热加强，环、壁表面温度降低，结果活塞环的寿命就从一百多小时增加到了二千一百多小时。

活塞环寿命达到二千一百小时还没满足使用要求。要进一步延长它的寿命，还必须提高环与壁之间彼此的贴合程度。活塞环同气缸壁经过精密加工，看上去完全贴合。其实，由于两者是分开来进行加工的，加工条件的差别，决定了环、壁的完全贴合是不可能的，双方在几何形状上实际存在着许多互相抵触的部位。万匹机的气缸大，这些抵触部位也多。这是环、壁产生剧烈磨损的又一原因。

但是，任何机床都只能把环、壁分开来加工，无法把它

们联系起来同时进行加工，因此也就不可能完全消除这些互相抵触的部位。除了机床加工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工人同志对机床工作原理进行分析，认识到加工金属部件的机床虽然种类很多，但本质上都是通过刀具与部件的互相磨损来加工的。车、刨、铣、钻、镗……都是不同形式的“磨损”。那么，活塞环与气缸壁在相对运动中的互相磨损不也是一种形式的加工吗？而且这种加工还打破了机床与部件的界线，你磨我，我磨你，既是加工者，又是被加工者，这实际上就是把环、壁分开来的个别加工变成了环、壁联系起来的同时加工。既然不能依靠机床把环、壁磨合，能不能“将计就计”，想办法使环、壁相克相成，在相对运动中互相磨合呢？

工人同志曾用一只新缸、新环在船上做磨合试验，结果非但磨不合，而且愈磨愈不合。原来，造环、壁的材料虽然都是高级合金铸铁，响当当，硬梆梆，但合金本身就包含着多种金属，它们中间，敲起来并非都那么响，磨起来也不都那么硬，硬中有软，软中有硬。“峣峣者易折”，在互相抵触部位磨损过程中，那些最硬的金属颗粒，反而是最先剥落下来，夹在环、壁中间，使原来环同壁一对磨损矛盾变成了粒同环、粒同壁、环同壁三对矛盾。颗粒被环、壁磨碎了，环壁表面也留下道道拉痕，拉痕增加了，环壁表面凹凸不平，又造成更多的颗粒剥落。

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呢？工人同志从平时磨剪子、镗菜刀受到启发，要是干磨，刀、石剥落的颗粒大，愈磨愈钝。

要是湿磨，刀、石剥落的颗粒又小又细，愈磨愈利。如果在环、壁的磨损过程中，增强互相抵触部位的润滑状态，使剥落的颗粒很小很细，矛盾就可以解决了。但那些凸出的部位贴得最紧，针插不进，油泼不进，怎么办？工人同志把活塞表面车成许多油沟槽，槽里藏油，改善了环与壁之间的磨合条件。这样一来，活塞环的寿命大大延长，可以从一千一百小时增加到五千小时以上，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增压器效率是怎样提高的

万匹机除了必须耐磨外，还要求功率高。万匹机运转的动力是通过空气与柴油在气缸内燃烧爆炸推动活塞而产生的。气缸内无气，就不能造成燃烧爆炸；有气而不足，也不能使更多的油得到充分燃烧，万匹机运转的劲头也不会大。要使气缸内保持充足的空气量，就要增加空气的压力，这种压力是靠增压器产生的。因此，要有功率高的万匹机，就要配有压力大的增压器。

国产万匹机最初用的增压器基本上是仿造国外的。这种增压器在设计上虽然有国外比较定型的产品为依据，使用起来却不能达到一定的压力要求。由于压力小，气缸内油和气的燃烧不充分，不仅影响了万匹机的效率，而且未燃尽的油滴夹在废气中，散到那烧到那，造成排气温度过高，加剧了气缸的磨损，还影响了万匹机的寿命。

仿造的增压器为什么增压不高呢？原来，一事物总是

和他事物互相联系着的。增压器本身由涡轮和压气机这两个相互联系着的部分组成，这两个部分又同万匹机的气缸联系着。压气机靠涡轮带动、运转，将空气压入气缸，而涡轮转动所需要的能量，又来自气缸内排出的废气。这样，压气机、涡轮和柴油机气缸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有机联系。要提高增压器的效率，关键在于三者之间的匹配要适当。匹配不好，就象吹笛没吹到眼上，气吹得再多也成不了调。现在万匹机是国产的，增压器却是仿造的。穿中式服装戴洋帽子，总有些别别扭扭。显然，要使增压器和国产万匹机相匹配，就要根据国产万匹机在各种负荷下所要求的空气量和压力，对仿造的增压器来一番改造，才能使增压器成为万匹机的得力“助手”。

不变革梨子，就不知道梨子的滋味。不动手变革机器，就不懂得机器工作效率不高的道理。在下决心改革之前，有人认为仿造的增压器是以国外已经定型的产品为蓝本的，担心弄得不好，可能愈改愈糟。但一动手改革，就发现增压器的构造看起来复杂，其实，它的整个工作过程，无非是利用气缸中高速排出的高温、高压废气，经过一系列能量转化，造成较大的压力，以提高气缸的进气密度，从而提高柴油机的功率。但在这一系列的能量转化过程中，能量的耗损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使这种耗损减少到最小程度，才能使增压器产生最大的压力。仿造的增压器之所以与国产万匹机不相适应，就因为它的能量耗损较多，减弱了它的工作能力。

怎样才能减少能量转化过程中的耗损，提高增压器压力呢？进一步的实践又使他们认识到，气流的压力，同气流的速度与其通过面积大小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气流通过面积的大小，是调整气流速度，保证一定压力的关键。但在原增压器中，废气通向涡轮的关口“喷嘴环”，它的尺寸就不适合国产万匹机的要求。喷嘴环的面积太大，气流速度太低，固然不能使涡轮高速旋转；如今是面积太小，造成废气通行不畅，能量不能充分利用，结果也减低了涡轮的转速。在连接涡轮的压气机中，高速旋转的空气流速大，压力低，需要通过扩压器减低速度，升高压力。但原来扩压器的气流通道面积却太小，气流的减速受到限制，压力也升不高。工人同志经过反复试验，终于掌握了“决定事物数量的数量界限”，选择了最合适的尺寸，提高了增压器的增压能力。

但事情并未到此结束。经过改造以后的增压器，总还有一部分能量，要随着最后排出的气体，经过“排气壳”，从烟囱进入大气而逃之夭夭。废气不能不往外排，随着废气一起外逸的能量也不能叫它来个“向后转”，重新进入涡轮作功。但是，这些废气，同正在涡轮中作功的废气是连成一气的。如果前面进入排气壳的废气流速能放慢些，后面正在涡轮中的废气就能充分地膨胀作功。因此，工人同志们又加大了排气壳的面积，这样就好象给废气开了一道宽敞的“太平门”，它们就可以“从容不迫”地逸散，也可以比较充分地作功了，从而进一步利用了废气中的能量。

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把增压器的每个部位都经过一番改造，整个增压器就“脱胎换骨”了，我国工人阶级自己制造的国产增压器也就产生了。再装到国产万匹机上，不但保证了正常功率，而且与国外同类机器相比，排气温度是最低的。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造船工人以高度的革命觉悟和极大的革命干劲，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走过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走的路程，造出了万匹机。这个事实，又一次说明，西方资产阶级办得到的事，我们不但可以办到，而且可以办得更好。目前，国产万匹马力柴油机的制造工艺还在发展中。广大造船工人决心再接再厉，在批林批孔运动的推动下，造出更多更好的万匹机，为祖国造船工业的发展作出新贡献。

（载《自然辩证法》杂志一九七四年第三期）

用辩证法改造发电机

上海电机厂工人写作组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号召下，我们厂和有关学校、科研单位共同协作，试制成了世界上第一台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推动下，我们厂的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又试制成一台新型的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这台发电机体积小、用料省、重量轻、发电能力大。它的发电能力接近我国同体积空气冷却发电机的八倍，工人们叫它“一顶八”。

在“一顶八”的试制过程中，充满着唯物辩证法同唯心论、形而上学的斗争。

怎样看待发电机的“极限”？

每台发电机的发电能力都有一个最大容量，叫做“极限”。如果超过“极限”，发电机就会产生高热、震动，以至损坏机器。

怎样对待“极限”，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态度。一种态度认为，多大的母鸡下多大的蛋，“极限”是绝对不可逾越的。要

增加一台发电机的发电量，只好放大尺寸。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发电机体积越来越大，材料越用越多，不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

“一顶八”设计小组与上述态度相反，认为“极限”是由一定条件造成的，条件变了，“极限”也会相应地起变化，决不是绝对不变的。发电机的“极限容量”主要取决于定子线负荷，即定子内圆圆周上单位长度所能通过的总电流量。而定子线负荷是随着发电机制造技术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一九五八年以前，我厂出产的空冷发电机的定子内圆圆周上所能通过的总电流量为每厘米六百安培，超过这个数字发电机容易损坏。当我们把发电机从空冷改为水冷、外冷改为内冷的时候，定子线上通过的电流量提高到每厘米一千安培。后来又提高到每厘米一千五百安培，这样一台发电机的发电量等于原来的四台。实践证明，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发电机容量有“极限”，但从科学技术发展的长河来看，又没有“极限”。因此，凡是出现所谓“极限”的时候，如果只在原有条件范围内作些改良，那当然是不能突破的；但只要我们采取革命的态度，积极创造出新的条件，就可以不断地达到更高的极限容量。把“极限”凝固化，看成是“顶峰”，这是形而上学的论点。

分而又连，制服转子发热

要突破发电机的“极限容量”，首先要解决转子的发热

问题。电流密度大了，转子导线要发热。发电机上到“一顶八”，发出的热量按照电流密度平方增加，转子导线里头的水就会象是开了锅，不但影响通水和冷却，还会破坏转子的平衡旋转，妨碍电机的运行。

但是，辩证法告诉我们，对不利因素要做具体分析，不利中包含着有利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能向有利转化。转子导线发热固然是不利因素，然而这个问题一暴露，矛盾的各个侧面充分展开，这就为解决这个矛盾提供了基本条件。

转子的铜导线发热，多通水可以降温。怎样增加通水量呢？一个办法是加铜线。铜线多了，水管子多了，进水也多。可是铜线一多，转子体积就要加大；转子一大，定子更要加大，发电机体积就要增大，不能达到少用料、多发电的要求。另一个办法是加压力。从外部用很大的压力把水压进转子里，压力大了，水流得快了，进水量也就多了。但是这么一来，水压高了，管壁要加厚，密封要加固，水路系统的水泵、阀门等也都要加大，同样不符合少用料、多发电的要求。

有没有别的办法？毛主席教导我们，事物都是可分的。为什么不可以把线圈从中间分开呢？一分，一个通道变成了两个，水路不就增加了吗？一分，水路缩短了一半，等于水阻减少了，流速加快了，水量不也就相应增加了吗？这样几路并进，等于既加了线又加了压，就可以使通水量成倍地翻上去，制服转子导线的高热。

可是，光分割线圈还不行。铜线的作用是双重的，不仅要通水，还要通电。光顾了多通水而把铜线割短，忘了多通

电,还是达不到多发电的目的。因此,导线既要分又要连,做到在通水时分,在通电时连,这样分而又连,才能在不影响多发电的前提下多通水。

做出了这种又分又连的线圈,还有一个如何把这种头绪繁多的线圈嵌进转子槽里的问题。工人同志在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教导的鼓舞下,创造了新的嵌线工艺,打响了夺取“一顶八”的第一炮。转子通水量翻了三番,温度从预计的一百多度降低到六十多度。

疏而又堵,制服定子发热

要改变“极限容量”,光解决转子的发热问题还不行,还需要解决定子端部的发热问题。定子发出大量的电,在定子端部也还生出无用的磁。这些漏磁撞到压圈上,就象流水碰到障碍物发生涡流一样,会产生涡电流,使端部发热。发电能力越高,发热也越严重。这是又一个难关。

在以往制造双水内冷发电机的过程中,曾经有过一些成功的经验,现在继续沿用这些老办法行不行呢?

一个办法是用水冷,就是在定子端部压圈里装几根水管子,冷却压圈。“单水”冷却了定子的导线,“双水”冷却了定子、转子的导线,这些都是行之有效的经验。导线发热集中,体积又小,从空心铜线中通水,可以解决问题。现在端部发热分散,体积又大,局部通点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发电机的端部发热还不太高的时候,水冷可以降低三、四

十度。但是，要使发电能力提高到一顶八，端部热度高到几百度，光是降低三、四十度，杯水车薪，根本不管用。

另一个办法是用电堵，即用电屏蔽挡住漏磁，“水来坝挡”，修上一道专门挡住漏磁的堤坝。这比起漏磁变热以后再用水冷的办法好多了。不过，这毕竟是消极防御。当发电能力上到“一顶八”的时候，漏磁大大增多，不管修几道“堤坝”都挡不住象洪水一样涌来的磁流。

辩证法告诉我们，矛盾着的事物总是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自己的反面。在一定阶段上适用的东西，在新的阶段上可能不适用，需要新的东西来代替。“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革命者要随着变化了的客观情况前进。水冷也好，电堵也好，在新的阶段都暴露了一定的局限性。只有跳出旧框框，才能别开新生面。

三结合设计小组的同志们深入现场，和工人群众一起分析了端部发热问题。发热是由漏磁引起的，着眼于降温退热固然是治标，着眼于堵塞涡电流也不是治本。对症下药，应当从漏磁本身想办法。于是，他们想到在定子端部搞一个磁屏蔽，让它把磁流吸引过来，再疏出去。这就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把为害的磁流引走。

是不是疏就是绝对的好，堵就是绝对的不好呢？不是。毛主席教导说：“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如果一味疏下去，漏磁会不听调度，在定子端部横冲直撞，引起高热。这就走到了反面。“一顶八”设计小组在疏的基础上来了个疏堵结合，在疏

的基础上适当地发挥堵的作用，做到又疏又堵，以疏带堵，以堵促疏，即疏浚了河道，又筑起了堤坝，使漏磁更加驯服地听从指挥。定子端部发热预计要高达几百度，这样一来，一下子下降到八、九十度，定子导线上通过的电流可以提高到每厘米三千安培，再一次打破了“极限”，大大提高了发电机的发电量。

定而又活，克服端部振动

“一顶八”解决了发热问题，可是又产生了振动问题。为什么会产生振动呢？这是因为电能在传导过程中，使定子与转子之间、导线和导线之间、导线与端部之间，出现了不平衡，发生电磁振动。振动久了，水滴石穿，会把绝缘磨损。过去当发电机的发电能力达到“一顶四”时，曾经在端部采取了粘牢下层线圈的办法，让振动分散到线圈总体上，达到了基本的平衡。但当发电能力要上到“一顶八”时，上下左右的振动都加剧了，有的每秒钟振一百次以上，光粘下层线圈就不顶用了。怎么办？

我们曾经设想，用特殊的粘固材料把端部线圈上下层粘牢，粘得越死越好，这样来分散端部承受的撞击力。谁知粘成铁板一块以后，局部达到了平衡，但电磁振动转移到整体上，会引起全局的不平衡。何况“铁板”里头也不是清一色，有铜，有钢，有绝缘材料，钢又有不同型号，绝缘材料也各不相同。它们受热膨胀时，有的膨胀得多，有的膨胀得

少,你拉我拽,发电机某些薄弱部分发生崩裂。再说,全粘死了,还要不要检修?防振为了避免损坏,可是谁能担保这么一来就永不损坏呢?全部粘死,一旦局部损坏又怎么进行维修呢?不能拆修,会使整个发电机报废。显然,“愈死愈好”的想法是我们头脑里的形而上学在作怪。

事实教训了我们:振动就是不平衡。对不平衡,放任自流不行,搞绝对平衡也不行。平衡总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无条件的。为了解决发电机振动的问题,我们必须求得相对平衡,使线圈之间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把振动控制在一定范围里面。我们采取的具体办法是,定两头,活中间,使导线定而不死,活而不乱,在绝对的不平衡中求得一定范围内的相对平衡。这样,就基本上解决了“一顶八”由振动而引起的磨损问题。

路线的正确与否决定一切

毛主席教导我们:“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只有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调动广大工人群众和革命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把大家的思想认识路线搞正确,才能把辩证法运用到试制新型发电机的科学实验中去。

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一点:当我们从单水跳过氢冷搞“双水”,使发电能力达到“一顶二”时,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以“视察”为名窜到了我厂,鼓吹和推行爬行主义,刮阴风,泼冷水,妄图把“双水”扼

杀在摇篮里。当我们把“双水”再向前推进一步，上“一顶四”时，他们又以“双水”还不巩固为借口，大叫“停水冷”、“拆水冷”，妄想开倒车葬送“双水”。后来当我们试制“一顶八”时，我们有的同志也曾担心“一顶四”还没有完全巩固，试制“一顶八”是不是步子太快？

从认识论上来看，这里有一个积极巩固还是消极巩固的问题。究竟是在发展中求巩固还是停顿下来求巩固，甚至在退却中求巩固呢？马克思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当我们试制“一顶四”时，发热、振动等矛盾已经开始暴露，但是当时还仅仅是个“征兆”，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到了试制“一顶八”时，矛盾得到比较充分的暴露，“征兆”转化成为“症结”，才认清了事物的本质。我们搞“一顶八”，不仅是为了解决问题，也是为了提出问题，而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一顶八”试制成功以后，把它解决发热、振动的措施用在“一顶四”和其他型号的发电机上，又逐步提高了这些产品的质量，“一顶四”也得以定型和投入成批生产。如果当时只停留在“一顶四”的试制阶段，就不仅没有“一顶八”，连“一顶四”也得不到巩固。

“一顶八”是不是完全巩固了呢？不是。任何事物总是又巩固又不巩固。巩固是相对的，发展是绝对的。一些方面巩固了，又会暴露出另外一方面的不巩固，又要进一步发展。“一顶八”在整个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发展的历史长河

中完成了一定的历史任务,但同时又提出了新的任务。它较好地解决了转子和定子的发热问题,为制造更大容量的汽轮发电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余地。它也初步解决了振动问题,但在这个方面余地不多。要制造更大容量的发电机,振动问题可能更加突出。同时,煤耗也是个问题。同一台发电机发电能力愈大,电在通过导线时的损失也愈多,发电时煤耗就会增大。我们要在已有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用辩证法改造发电机,使它能够用更少的料,发更多的电。同时积极研究如何改进发电机的内部结构,降低煤耗,继续在发展中巩固“一顶八”。

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在试制新型发电机的过程中作出了一些成绩,但是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还很远。今后,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掌握与运用唯物辩证法,进一步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电机工业做出贡献!

(载《自然辩证法》杂志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螺蛳壳”里天地大

上海自行车三厂第九车间党支部

我们车间的场地，原来是一个专门从事自行车装配业务的工场。归并到我厂后，一九五八年改建成专门生产凤凰牌自行车车架的车间，年产车架八万只。到一九六五年，年产车架三十八万只，产量增加了近四倍，场地却还是那么大。有人编了一首顺口溜：“螺蛳壳，小车间，遍地车架堆成山，跨爬钻兜到里面，进进出出实在难。”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不断发扬穷棒子精神，在这个已经十分拥挤的“螺蛳壳”里，一九七二年的产量又比一九六五年增长了一倍半。大家高兴地说：“螺蛳壳里天地大，挖潜力靠辩证法。”

巧安排，空间潜力大

生产一发展，场地就得扩大。车架材料和设备的增加总得有个地方摆呀！有些同志算了一笔账：全车间三千三百平方米建筑面积，除去食堂和机器设备的占地，剩下来可

供生产周转的用地只有二千一百多平方公尺。在这个空间里,要容纳二百多个工人操作,近万只车架材料在一百多道工序中流动。有的同志说:“车间里水泄不通,一只蟹也爬不进。要增加生产,就得增加厂房。”是啊,车间的生产早已象“螺蛳壳”里动刀枪,挤得叮叮当当。但是,要扩大厂房面积,车间四周都是民房,根本没有什么空地。就是另盖新厂房,短时间也不能投产,远水解不了近渴。

场地利用真的到了饱和点,连一只蟹也爬不进了吗?列宁说:“认识是思维对客体的永远的、没有止境的接近。”(《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三千三百平方米场地是一个有限的空间,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和利用,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不能说已经到顶。事实证明,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发扬找缝插针的精神,车间里不是一只蟹也爬不进,而是一条“牛”也能牵入。例如,为了利用余热自制蒸馏水,需要增加一台蒸馏设备。设备比牛还大,那里去找“牛棚”?正当我们为难的时候,群众提出,楼梯下有一角空地。可是,那里外高内低,设备放不进去。群众说:“没有关系,量体裁衣嘛!”他们根据三角形空间的特点,自制一台土蒸馏设备,刚好对号入座。又如,为了提高油漆的光泽度和耐用性能,扩大原有设备的生产能力,要在这已经“满座”的车间里,把原来十四米长的红外线干燥设备延长到二十四米。哪里是落脚之地呢?群众说,“没有地,还有天嘛!”于是,在二楼破墙而出,小天井上搭了一只阳台,让走投无路的干燥设备在这里安家落户。

是啊，空间不单是平面的，还是立体的。思想上开了窍，车间中最棘手的车架堆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以前，车架在场地上一一直是竖着排列，每平方米场地只能放十只。现在，我们从利用空间高度入手，用横叠代替竖放，使每平方米场地的车架堆放量一下子猛增了七、八倍。横叠车架要小心轻放，由于堆得高，操作比较吃力，但是大家却干得很欢。

车间空间的利用，除了往高度上发展外，也还有其他的潜力可挖。十个手指有长短，各部门的情况并不一致，大部分小组确实场地紧张，而有的小组却仍有潜力可挖。譬如包装小组，过去是车间中有名的“占地老虎”，十八个人，每人一摊，前后左右，车架拥挤，有时还常常扩展到别组场地。后来，他们进行技术革新，十八个摊头集中到了一条流水线上，一下子腾出了二十多平方米的场地，为贴花划线小组改造设备、提高产量创造了条件。

原来算细账的同志在事实面前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们说：“算死账，场地硬绷绷；巧安排，空间潜力大。”

流速快，时间化空间

空间的利用毕竟是有了一定限度的。随着生产任务的进一步增加，场地就又变得十分紧张了。有人说：“橡皮车间只能吹涨到一定限度，这下子可是山穷水尽，潜力挖不出来了。”

是不是真的山穷水尽，潜力到顶了呢？生产，是一个从

原材料到产品的运动过程。“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间是和空间互相联系着的,在一定条件下,时间可以转化为空间。车间的空间越大,生产活动的余地也就越大。但在同样大小的场地里,如果把生产流速加快,使生产周期缩短,也就等于增加了场地面积。这好比人民广场,如果坐在这里开半天会,就只能容下十几万人;如果是游行,那么,半天内通过广场的人数将会是几十万、几百万。

加快生产流速,就要抓薄弱环节。油漆小组的三台烘箱开足三班,日产量还只在一千四百多只的水平上。大批车架流到这里,给卡住了。不畅通这个“喉咙口”,车架生产就跃不上去。烘漆工人根据长期的实践经验,破常规,搞革新,把烘漆时间一下子缩短了将近一半,使日产量突破了二千大关。由于车架不再大量积压,烘漆小组的生产场地不仅改变了十分拥挤的局面,还进一步改善了上下工序的活动空间。

毛主席说:“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事物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车间里的情况也是这样。缩短了烘漆时间,促进了车间生产的发展,但是,却也给车间生产带来了新的矛盾。烘漆一上去,车架的焊接工序就成了车间中新的薄弱环节,大量车架在这里堆积起来。我们又发动工人猛攻这道关口,用机械盐浴浸焊代替手工操作,使焊接速度一下子加快了一倍多,操作空间也因车架不再大量积压而得到改善。随着生产流速的加快,

不久前才摘掉“喉咙口”帽子的烘漆工序，又变成了薄弱环节。于是，我们又发动工人，搞起了一条红外线烘漆流水线，使烘漆时间进一步缩短为九分钟。

在加速车间生产流速过程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生产中只能有相对的、暂时的平衡，不可能有绝对的、永久的平衡。旧的薄弱环节的克服，同时又会有新的薄弱环节出现，又必须集中全力围而歼之。一浪追一浪，后浪逐前浪。各个环节的先后突破，形成了技术革新汹涌前进的浪潮，大大加快了我们的生产流速。几年来，我们已使整个车间的生产周期从六天减为三天，等于给车间扩大了一倍场地。大家说，“搞革新，流速快，‘螺蛳壳’里夺高产。”

缩流程，省地又省时

加快了生产流速，“螺蛳壳”里的产量翻了一番。场地的潜力是不是已经挖尽了呢？没有。单机流速是快了，但整个车间的生产流程不合理，再快也是慢。我们车间是在老厂的基础上一步一步地改造过来，在生产流程上，不象新厂那样有比较合理的布局，许多地方仍有生产倒流、工序过多等情况。譬如，车架焊接，用机械盐浴浸焊代替手工盐浴浸焊以后，虽然加快了焊接速度，但是，因为车架由前后两只三角架组成，要分两次焊接。而焊接车架的盐浴炉，由于场地限制，车间里一直只有一只，只能是上午全部焊接前三角架，下午回过头来，改焊后三角架。结果，几千只车架在两

次焊接中间大面积堆放，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工人群众把它比为祝家庄里的“盘陀路”，他们说：“盘陀路上行汽车，开足马力快不了。”

焊接组要缩短生产流程，就需要增添一只盐浴炉，以改变生产倒流的状况。但一只盐浴炉及其操作场地，最少也得有五、六十平方公尺。有人说：“如果有这块场地，盐浴炉早就增添，何必等到今天。”确实，从静止的、孤立的观点来看，场地已经被设备、车架塞得密密麻麻，无论如何也找不出这五、六十平方公尺的空地。但是，车间里各小组之间，也都是相互联系，互相作用的，正是这个相互的联系和作用构成车间生产的运动。只要是不把生产看成一个停滞、孤立的过程，那么，我们就能够从各小组的相互联系和运动中争得所需要的空间。譬如车架下管上有一种卡住打气筒的定位钉，要经过钻眼到铜焊等五道工序，由于铜焊焊口经不起焊接车架时的盐浴炉高温，定位钉不能先焊接在单根钢管上，而只能在车架成型后再焊。这样，已经成型的车架就又要经过一次大面积的堆放。以后，我们改革了定位钉的焊接工艺，用自动点焊机代替手工铜焊，并五道工序为一道，大大缩短了焊接流程；而且，由于点焊焊口经得起盐浴炉的高温，定位钉焊接就可以在车架焊接之前进行。这不仅加快了焊接速度，而且还腾出了二十多平方公尺场地。

车间一发动，各组齐动手。大家通过压缩工序，缩短流程，腾出了不少场地，这就使正在安装的新盐浴炉有了立脚之地。新盐浴炉安装以后，“盘陀路”就可变为直通道，使

车间的生产流程进一步缩短，为生产的更大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几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场地小，固然是生产中的一个不利因素。但是，场地小，并不等于没有潜力可挖，不利的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向它的反面转化。螺蛳壳里自有广阔的天地。毛主席说：“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继续革命，努力前进，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张载养、袁思楨整理，载《自然辩证法》杂志
一九七三年第二期）

变废为宝无止境

上海燎原化工厂革委会

我们厂是个有四十多年历史的化工原料厂。解放以来，随着生产的发展，排出的废水、废气、废渣也逐渐增多。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期，每天约有十几万立方米有害气体上天，一万多吨污水下河，还有大量废渣排放。过去，我们曾经采取过一些防治措施，但是，效果不太显著。一九七一年以来，我们打了一场除害兴利、变废为宝的人民战争，使有害气体在正常生产的情况下基本得到控制，废水有百分之七十得到回收利用，废渣有百分之九十得到处理。我们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变废为宝的规律，从而在生产中有了更多的主动权。

从“降龙”看多吸少排

盐酸是我厂的主要产品之一。在盐酸生产过程中，过去总有部分未被吸收的氯化氢废气，排放高空，随风翻滚，活象一条腾云驾雾的“白龙”。

怎样降服这条“白龙”呢？开始，我们想：氯化氢气体能溶解于水，那就来个“遇气水解”吧！于是，就造了一座尾气吸收塔。把废气灌入塔内，用水喷淋，“白龙”果然消逝了。但是，这座尾气吸收塔每天又产生大量含有酸性的废水，排入苏州河，污染水质，腐蚀管道和船舶。

“白龙”潜入水中继续害人，我们就跟踪追击。既然水中含酸，我们就来个“酸用碱解”，把尾气吸收塔放出的废盐酸水用废碱水中和。但是，要中和掉大量的废盐酸水，不但要用大量的碱水，而且酸碱水很难达到适度平衡，经过中和处理的废水非酸即碱，仍然有很大的腐蚀性。

为什么两次“降龙”都是降而不服呢？毛主席说：“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我们在对废水、废气的性质、关联和它们内部的规律都还缺乏正确的认识的情况下，采用以水攻气、拿碱压酸的简单办法，结果当然要受到盲目性的惩罚。我们从这段弯路中吸取了教训，决心努力认识三废的规律性。

事情又回到盐酸生产过程本身。氢气与氯气通过燃烧化合产生氯化氢气体；再用水吸收氯化氢气体得到浓盐酸。在这个物质的分化组合过程中，部分未被水吸收掉的氯化氢气体放入高空，这是“白龙”的由来。盐酸工段的操作工人说：“要降服‘白龙’，关键在于生产盐酸过程中对氯化氢气体多吸少排！”这一提使大家思想开了窍。毛主席有一个

深刻的论述：“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吸和排是一对矛盾，它们互相转化的条件是什么，这是有待进一步认识的。当时工人同志根据长期的实践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冬天废气少、产量高，而夏天废气多、产量低呢？这说明，气温的一冷一热，废气的一少一多，产量的一高一低，它们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为了找到这种联系，许多同志深入生产现场精心观察，发现氢气与氯气在燃烧化合生成氯化氢气体时，温度高达 800°C 。当炽热的氯化氢气体经过自然冷却的管道送到吸收塔用水吸收时，温度还在 150°C 以上。同时，吸收氯化氢的过程中，又会放出热量，增加吸收液的温度。温度高，吸收率就比较低，部分未吸收的氯化氢气体就逃跑了。这就告诉我们，只要进一步采取降温措施，多排少吸就有可能变为多吸少排。

主攻的方向明确了，工人同志和技术人员结合在一起进行了工艺改革。第一，适当加长从反应炉到吸收塔的管道，以便增加冷却时间；第二，变自然冷却为水冷却，提高冷却效果；第三，用水膜式吸收代替喷淋绝热吸收，可以带走吸收塔内产生的热量，提高吸收率。这样一来，氯化氢气体进入吸收塔时，温度由原来的 150°C 下降到 60°C ，氯化氢的吸收率从原来的百分之九十七提高到百分之九十九点六以上。最后剩下微量的尾气，通过循环回收的办法，又造成了盐酸，这就使废气基本上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了治理。

以废治废可以得宝

化工生产是促使某些物质化分与化合的复杂的转化过程，绝对的不排是没有的。那末对吸不尽而排出的“废”又怎么办呢？

有一件事给我们启发很大。我厂三氯化铁这个产品是用废铁加氯气生产出来的，而在生产三氯化铁的同时又产生两种“废”：一是尚未完全反应排入高空的氯气尾气；二是放进废铁后结下的炉渣。工人同志说：要是能使两个“废”联合起来，让它们“自己解放自己”有多好啊！

有一次，工人同志正在出炉渣，突然雷雨大作，过去要用榔头敲十几小时才能消除的炉渣，被雨淋过后却一捅就碎，哗哗地落下了。这一下暴露了炉渣溶于水的特性。经过化验发现，遇水即碎的炉渣中含有二氯化铁。有一位工人说：“这家伙可是个‘宝’啦，我们生产的三氯化铁就是比它多个氯嘛！”大家进一步作了分析：原来排出的两个“废”之所以叫做废，就是因为一个（氯废气）缺铁，一个（二氯化铁）缺氯，这真是你需要我，我需要你。数学上有所谓负负得正，化学上为什么不来它个以废治废、废废得宝呢？

我们决心试一试。当我们把含有二氯化铁的炉渣废水，抽到氯尾气吸收设备内以后，果然反应成了三氯化铁溶液，送到自来水厂使用，受到欢迎。工人同志高兴地说：“以废治废真正好，消灭两个废，得到一个宝。”

后来，我们又想拿以废治废的办法来治生产尼龙过程中冒出的废气。这种废气中含有少量的二氧化氮。我们想，如果把它和烧碱液化合生成亚硝酸钠那有多好！谁知这一试却不灵。因为二氧化氮气体和烧碱液在管道内经过化学反应，虽然能生成亚硝酸钠，但是亚硝酸钠是种结晶体，阻塞在管道内壁，连水蒸气排出都发生困难。这真是因废得废！

同样是以废治废，为什么两次结果大不一样呢？毛主席说：“因为一切客观事物本来是互相联系的和具有内部规律的，人们不去如实地反映这些情况，而只是片面地或者表面地去看它们，不认识事物的互相联系，不认识事物的内部规律，所以这种方法是主观主义的。”我们对不同的“废”的互相联系及其内部规律不认识，或者只是片面地和表面地去看，就套用老经验，把二氧化氮和烧碱液凑到一起，这是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前一次以废治废能“废废得宝”，是因为认清了氯气和铁的联系和它们互相转化的条件，找到了它们互相结合的规律，所以成功了。后一次以废治废则“因废得废”，是因为只看到二氧化氮同烧碱液可以结合的一面，不知道亚硝酸钠会阻塞管道的一面，所以失败了。这说明要达到以废治废的目的，不仅要研究废和废之间在化学性质上的联系，而且还要考虑到它们结合以后的出路。根据这样的认识，我们改用废氨溶液同二氧化氮化合，产生了肥效很好的硝酸氨肥。既除了废，又得了宝，一举两得。

以废治废的实践告诉我们：不仅要对各种“废”的特性

进行具体分析，而且还要努力寻找这一“废”和那一“废”之间的联系。如果静止地孤立地看，“废”就是废；如果找到它们各自变化的条件和规律，把它们联系起来，促使它们结合起来，就能变废为宝。象我们这样多品种生产的化工原料厂，“废”是多种多样的，以废治废的前途也是十分广阔的。

从分化瓦解到综合利用

在治废的过程中，我们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有一些废一经治理可以变宝，但同时又产生新的废，废不是“搬家”，就是“变了形”。这时往往有人说：“反正是治了老废出新废，能把有毒的废变成无毒的废就不错了。”多数同志不赞同这种对三废的“让步”政策，而主张通过彻底革命，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这样两种看法，反映了治理三废中两种世界观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厂对电石渣处理的过程就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电石和水发生化学作用生成乙炔的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废渣——电石渣。日积月累，填满小河，堆满场地，象白茫茫的小山丘。

电石渣是绝对有害的废渣吗？我们对它进行了化验分析，它的主要成分是氢氧化钙。既然生石灰加水能生成氢氧化钙，那么，我们能不能把电石渣中含的氢氧化钙分化出来代替石灰？我们与有关厂一起试验的结果，证明是可以的，而且是一种质量较好的建筑材料。大家又联想到，我厂

生产的漂白液也是石灰加水以后同氯气化合而成的。这就说明,电石渣不仅可以代替某些建筑材料,而且另有更好的出路。经过试验,完全可以用电石渣代替石灰生产漂白液。

从电石渣到漂白液,这个单纯的分解化合过程可以说是完成了。但是,由于漂白液在我们厂只是生产另一种产品氯仿的原料,当漂白液同乙醛化合得到氯仿的同时,又排出了另一种废料——氯仿渣。当时有人说:电石渣换成了氯仿渣,此废变彼废,没啥稀奇。表面看去,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仔细一想,由电石渣到氯仿渣是一个进步,这一变不是“废”的简单重复,而是通过分化发生了质变,包含有新的内容。

恩格斯说过:“一个新的事实被观察到了,它使得过去用来说明和它同类的事实的方式不中用了。从这一瞬间起,就需要新的说明方式了”。认识世界是这样,改造世界也是这样。实践使我们懂得了电石渣是可以分化的,我们不是也可以继续对氯仿渣分化下去吗?通过分析,氯仿渣中含有氯化钙和氢氧化钙,而氢氧化钙通入废盐酸水也可以化合成氯化钙。氯化钙又是有用的工业原料,我们与有关单位一起用它做原料,试制成了质量很好的牙膏。我们还在进一步为它寻找更为广阔有效的用途。

从电石渣到漂白液,从漂白液到氯仿渣,再把氯仿渣变成有用的工业原料,这是一个不断对“废”分化瓦解的过程,也是一个变废为宝的积极转化过程。恩格斯说:“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

别”。对“废”的每一次分割，都是一次变化。事物是无限可分的，分割到一定的限度，就由量变的积累发生质变的飞跃。实践表明，对三废从分化瓦解到综合利用，就是一个变废为宝的过程。从整个工业生产来说，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但不应当消极地把这看成是“生产无止境，三废除不尽”的循环，而应当从这个螺旋形上升的辩证关系中受到鼓舞，坚信生产的发展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治理三废也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积极地综合治理三废，这是有着无限广阔的前途的。

(孔幼贞、顾舒协助整理，载《自然辩证法》杂志
一九七四年第一期)

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导铁路运输

中共上海铁路分局南翔编组站委员会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联系生产斗争的实际，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铁路运输，正确处理运输工作中的各种矛盾，运输效率不断提高，运输生产面貌焕然一新。列车始发正点率一直稳定在规定的指标上，列车中转停留时间大大缩短，运输效率提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我们深深体会到：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不但是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也是指导铁路运输，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的强大思想武器。

举纲带目，大打安全运输仗

安全运输，是搞好运输生产的重要环节。今年上半年，车站安全情况一度不很好，影响了运输生产。问题在哪里？有的同志认为，主要是规章制度不落实，有的职工没有按照安全操作规程办事。于是，干部便纷纷下去抓安全，抓操作规程，抓制度落实。可是事隔不久，又发生了一起行车事故。

问题到底在哪里？遵照毛主席关于调查研究的教导，我们组织了调查组，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带队，到影响安全生产的关键车间——下行车间，一边跟班劳动，一边调查研究。

毛主席教导说：“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说战略胜利取决于战术胜利的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又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我们体会到，纲和目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战略和战术的关系相似。我们在调查时，注意了从战略着眼，也就是力求找出其带有全局性的原因。在下行车间，我们对情况不同的两个班进行重点调查。一个是安全生产搞得较好的班，一个是安全生产搞得较差的班，着重研究他们各自的原因。经过调查分析，我们发现：关键在于深入开展批林批孔，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一个班批林批孔这个纲抓得不牢，政治思想工作一度放松，资产阶级思想趁虚而入，造成团结涣散，组织纪律松懈，歪风滋长，在短期内连续出了两次行车事故。另一个班批林批孔搞得好，政策落实，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全班同志精神振奋，工作责任心强，制度遵守得好，运输生产日趋主动。从这里我们体会到，纲举才能目张。只有搞好批林批孔，才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规章制度得到落实；如果放松批林批孔，丢掉纲去抓目，群众的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即使力气花得再大、再多，安全生产还是抓不好的。这也就是说，要把着眼点放在战略上，而不是放在战术上，用战略去统帅战术。联系到叛徒卖国贼林彪在辽沈、平津战役中，顽固地推行他的“六个战术原则”，在战略上过高估计敌人的力量，

过低估计群众力量，给革命战争带来了损失，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必须继续搞好批林批孔，以纲带目，打好安全运输仗。于是，就举办了学习班，同这个班的干部群众一起学习毛主席、党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一系列指示，一起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党委负责同志带头做好干部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党的政策，全班革命团结大为增强，出现了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大家在生产中互相协作，紧密配合，不仅保证了安全生产，而且提高了运输效率，列车中转时间大大缩短。

抓点是为了带动面，在此基础上，我们在整个下行车间狠抓批林批孔，大力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一个多月来，我们走访了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职工家庭，增强了革命团结，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与此同时，还认真做好班组安全生产经验的总结和推广，整个车间出现你追我赶力争上游的局面，连续两个月消灭撞车、挤岔、脱轨三大惯性事故。实践给予我们很大的教育：抓生产不能就事论事，只有举纲带目，才能快马加鞭。

集中兵力，全力开好关键列车

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还是分散兵力打击溃战、消耗战，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毛主席历来主张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解放战争时期辽沈、平津战役的胜利就是

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光辉思想的胜利。叛徒、卖国贼林彪一贯反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辽沈战役中多次违抗毛主席集中兵力主攻锦州的指示。只是由于毛主席的正确领导，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才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原则，也是指导我们搞好运输生产的重要原则。我们站每天要到发一百多趟货物列车，进出五千多辆车皮，每一趟列车都要在我站进行技术检查、解体编组、调车作业，然后按照它的去向、到达目的地，编组发车。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货物列车编组发车比较省力，有的则比较吃力、费时。而每趟列车的开出时间都是有规定的。如果有一趟列车不能按时开出，就将影响此后一系列列车的正点运行，影响运输。因此，那些费力、费时较多的列车能否准时开出，就成了提高运输效率的关键。在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改变了过去平均使用力量的做法，注意开好关键列车。根据车辆回路，选择主攻方向，把人力、物力集中到对全局来说最关紧要的列车上，突破了车辆排风、连挂等重点作业，缩短编组时间，保证正点开出，取得了较好的成绩。铁路运输的协同性十分强烈，在突破关键列车时，除了自身的力量要集中而外，还必须争取列检、机务等兄弟部门的密切配合，把内外力量拧成一股绳。因此，我们还注意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争取这些单位的大力协助，为我们开好关键列车，搞好列车编发创造有利条件。

今年来，上级领导先后多次组织高产大会战。高产会

战，就其实质来说，也是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在生产斗争领域里的具体应用。我们在高产会战中也坚决按照这个原则办事。九月下旬的一个夜班，正值路局高产会战第二个下半夜。编组的二五五二次列车，五十三个车皮全都是送往沪宁线沿途各站的支农物资。这是一趟关键列车。为了及时支援农业，保证会战胜利，列车必须在一点三十分正点开出。否则后面的列车将循环编晚，严重影响车辆中转和正点始发。但在下半夜迷雾突然增大，给调机编组作业带来很大困难，眼看就要晚点。于是，我们立即组织各级干部赶到现场，集中各方面的力量，扑到关键列车上。调度员、值班员、调车组也适应新的情况，及时制定计划，各工种紧密配合，早出勤，勤检查，进行快速作业。既提高了效率，又保证了安全。按常规，接管（列车制动用），由列检负责。这时，调车组的同志一齐出动进行抢接。这样，编好一列货车，只用了十八分钟，使原来要晚点的列车提早四分钟出站，使路局高产会战得以胜利进行。

立足全局，发扬共产主义协作精神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的统一。全局由局部构成，但全局高于局部，局部必须服从全局，受全局的制约和影响。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是如此，运输生产中的全局和局部关系也是如此。

开始，我们在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上也是不自觉的。

今年，有个新建的兄弟编组站因开站不久，作业一时跟不上，影响了南北干线的畅通。分局党委要求我们承担该站部分运输任务。当时，有的同志感到自己站的任务已经很重，还要帮助外单位编组列车，既增加作业，又延长车辆集结时间，势必影响本站年度任务的完成，主张“推出去”。为此，我们及时组织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要提倡顾全大局”和“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等教导，深入批判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对抗毛主席、党中央统一指挥，破坏革命全局的罪行，加深了对全局观念的理解。大家说：整个铁路是一部大联动机。保证铁路干线的畅通，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全局。我们南翔编组站是这部机器上的小齿轮，地处上海地区的喉咙口，南北干线的汇合点。我们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整个铁路运输这个大局。因此，必须把我们这个局部工作做好。为了整个干线的畅通，我们就是要承担更多的任务。认识提高后，大家坚决表示：为了保全局，困难再大也要上，为了保畅通，任务再重也要接。于是，我们深入车间、班组，向职工谈形势、交任务，激发广大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挖运输生产潜力，及时完成了支援兄弟站的任务，为保证全局运输畅通尽了自己的力量。局部保全局，全局促局部，由于全局的运输畅通了，停留我站的满载货物列车源源开出，大大加快了车辆移动和列车中转速度，促进了我站运输效率的不断提高。

（载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三日《解放日报》）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运用毛主席军事思想指挥 港口装卸的一点体会

上海港务局第三装卸区革委会

我们海港工人，天天战斗在码头上，快装快卸抢时间，那个劲儿，可真象打仗！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货船越来越多，吞吐量日益增长，装卸工作更加紧张。但我区的场地、仓库还是原来的面积，泊位、人员没有增加，机械设备也没添多少。然而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运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

打有准备之仗，这是我们指挥装卸打胜仗的重要保证。港口装卸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复杂多变，来的船有的是上万吨的，有的只有一、二十吨；装卸的货物品种多样，重的有几十吨，轻的只有几公斤；船的起重设备、舱口、放置货物的状况也不一样。以往，我们只根据对方港拍来的电报上所注明的货种及数量来配备“兵力”和机械。但因电报只告

诉我们货船的大致情况，因此，当船一靠码头开舱卸货时，往往发现货物的堆放同电报上告诉的对不起号。在任务急，劳动力、设备紧张的情况下，一时应付不了这种复杂的局面，结果造成被动。这个教训，使我们认识到，“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不能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所谓“有准备”，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知己”，就是要了解各装卸队的“兵力”和码头、场地、工具、设备的状况；“知彼”，就是要摸清作业的对象——船及其装卸货物的底细。“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我们为了做到有准备，不仅进一步了解“己”的情况，而且深入了解“彼”方，在船未进港前，先去船上“摸底”，弄清船上货物布局、顺序、船吊起重能力、货物流向等情况。然后，根据实地“侦察”的材料，编制具体的作业船图。这样，按照货物的布局，规定先卸什么货，后卸什么货；依照卸货的顺序和货物的特点来确定“兵力”，准备好相适应的机械，安排合理的作业路线；根据货物的流向，及早作好安排。我们把经过周到的调查所制定的计划向每个装卸队的工人交底，让大家心中有数，使人力、场地、机械设备都用在刀口上。

无准备和有准备大不一样。无准备，“兵”再多，机械设备条件再好，仓促应战，往往也要打败仗。相反，有准备，即使“兵”少，机械条件差，也是能打胜仗的。今年上半年，驶来一条远洋轮，其中载有卡车八十多台，有十台是重达十吨的油罐车，而电报只告诉了我们卡车的总数和总吨位。如果我们不掌握这一情况，没有准备好相应的起重设备，这几

台大家伙就不能及时拿下来。我们事前经过“侦察”，掌握了“敌情”，回来后就发动群众研究卸载、接运油罐车的方案。货重，没有专门设备，我们就预先准备好两台负荷五吨重的门吊联合起吊，船一到就有把握地拿下了油罐车。这就证实了毛主席所说的：“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

我们要在原有的“兵力”、场地、设备条件下，“吃下”越来越多的任务，这确实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我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军事思想，懂得了在指挥生产时，只要很好地运用毛主席这一作战原则，也同样能在人少、条件差的情况下，把日益增多的装卸任务一口一口地“吃下去”。

集中优势兵力，一定要正确地确定重点，即“选择突击方向和突击点”。这个重点，就是打歼灭战的目标。确定重点，就是抓主要矛盾，抓对全局起决定作用的环节。什么是重点，要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定。就拿船与泊位这对常闹的矛盾来说吧，我们区只有固定的几个泊位，而每天有許多船要靠泊，不及时解放泊位，就会直接影响其他船，不能完成预定的战斗任务。为此，我们经常根据具体任务的前后衔接，来确定重点船。然后，集中优势兵力进行突击。一次，有一条船必须赶在第二天清晨四时离港，因为另一条装有急需物资的船提前赶来，要在第二天早上五时靠这个码头。这样，前一条船就成了我们集中兵力攻克的重点船。这

条船第四舱还有钢板二百九十吨，费时长，而其他四个舱数量少，费时短。如果五个舱平分兵力，必然因为完不成第四舱的任务而不能准时起锚开航。能不能在短时间内攻下第四舱呢？我们按照突击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集中大部分兵力、设备在这条船上打歼灭战。经过努力奋战，终于保证了这条船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离开。

集中优势兵力，就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有了这种智慧和力量，就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变困难为顺利，变被动为主动，达到胜利的目的。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来了一条载有二万多吨生铁的巨轮，上级要求我们在当月三十日十八点前抢卸完毕。当时，有人扳着手指头一算，说：这么多生铁，短短几天叫“神仙阿伯”也拿不下来！我们和广大工人一商量，那就主意多，力量大。工人们说：为支援钢铁生产，我们拚着命也要用最快速度把它拿下来！各个装卸队抢接这个任务，科室和后方部门都主动抽出人力，已经退休的老工人也请战上火线。我们把一部分“增援部队”放在其他一般的船只上，集中了战斗力强的几个小组来执行这个任务。时间紧，我们就调来三台门吊，使原来的三条作业线，变为六条作业线；机械设备差，机修队的同志主动上前线，机车出了故障就动手抢修；干部也投入现场，边战斗、边指挥，碰到问题召开工人、干部“诸葛亮”会议，及时解决。结果仅用了五十三小时，就拿下平时需要花七、八天才能完成的任务，创造了我区装卸史上的最高纪录。我们区就是在人手少、仓库小、场地紧、设备不足的情况下，依靠工人群

众，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指挥装卸，做到了来多少货，吃多少货。

灵活机动，这是我们克服各种困难，完成战斗任务的又一个作战方法。“灵活性就是具体地表现主动性的东西。”有了这种灵活性就主动，没有这种灵活性就被动。一次，有一条两万多吨巨轮将抵达长江口，因这条船吃水深，而我们区的码头水位浅，靠不上。当时有人认为，人力是不能把大船推进码头的，还是把这条船交给码头水位深的兄弟区去完成吧！巨轮吃水深，码头水位浅，这是客观事实。但深与浅经过人的主观努力是可以转化的。我们分析了这种状况，和工人们一起研究出一个办法：打破常规，派了一支“小分队”乘两条驳船到长江口外，花了几小时先卸下一千多吨货物，这样船的吃水相对地浅了，乘着涨潮就靠上了码头。这说明无论是指导战争或领导生产，都要灵活机动地进行战斗。客观条件是死的，而办事情的人却是最活跃的因素。只要我们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就能更好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一些看来办不到的事情办成功。

灵活性所以能表现为主动性的东西，在于它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充分地挖掘潜力。吞吐量，仓库、场地面积小，这是我区近年来碰到的最尖锐的矛盾，群众称为“嘴巴大，肚子小”。“嘴巴大”可以增加吞吐量，这是好事。但“肚子小”，又怎么把它吃下去呢？有人说：多大的“肚子”吃多少“食”。其实，“肚子小”并不是不能吃下大的堆存量。我们的仓库分为“进口库”与“出口库”。这样区分，是必要的。但

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指挥使用。例如,进口仓库暂时有空余的地方,可以把短时间内就要装船出口的货物放一放。又如,仓库的堆存量的周转也不是呆板的,“肚子小”,可以加速它的“消化”。我们主动派人同货主单位联系,请他们提早出货,及时地周转了仓库、场地。再如,货物也可以用“船过船”、“船过车”的办法,减轻对“肚子”的压力。我们预先把装货、卸货的时间通知货主单位,同他们共同准备好船与车,把载运外地的货直接装上船,把卸下的大量的货物疏运出去。这样就等于扩大仓库、场地,解决了“嘴巴大,肚子小”吃不下的矛盾,改变了过去“货压货”、“货围货”的现象。如果死守条条框框,是不能在我们这个有限的场地上打胜仗的,只有“善用兵,巧安排”,灵活地作战,才能克服困难,挖掘潜力,办好事情。

毛主席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我们学习了毛主席指挥战争的这一指导思想,懂得了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港口的“舞台”上,导演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活剧”来,一九七三年完成的吞吐量比文化大革命前增长百分之二十六,今年三月又创造了历史上最高装卸纪录。但这还是序幕的开始,我们还要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导演出更威武雄壮的“活剧”来,夺取港口装卸的更大胜利!

(载《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十期)

一堂生动的哲学课

——51路公共汽车访问记

任 菁

在上海这个城市战斗和生活的人们，总免不了要乘公共汽车吧！可是，当你每天乘车上下班的时候，又可曾想到公交部门的同志，在为工农兵乘客服务、解决城市客运矛盾的过程中，进行了多少创造性的工作啊！

最近，我们到51路公共汽车队进行了短期的调查访问。下面是所见所闻的一些实际情况。

高峰期间

北站附近的早晨，熙熙攘攘的人群，川流不息的车辆，显得格外热闹繁忙。成千上万的人们络绎不绝，潮水般向设在鸿兴路上的51路车站起点站涌来，顿时出现了客运的高峰。你看，乘客们一股股向直达快车站走去，一股股向区间慢车站走去；有的排坐队，有的排立队；起点站的站务员象战场上的指挥员一样，招呼乘客，指挥车辆。很快，密集的

客流迅速分散了，一辆车接着一辆车开出，满载着从四面八方汇聚来的人们，奔赴吴淞工业区去抓革命，促生产……

我们夹在乘客中情不自禁地赞叹着：人多车挤，却秩序井然，51路汽车能这样适应高峰期间的客运需要，真不简单啊！这时，一位身着上钢五厂工作服的乘客对我们说：“同志，你是新乘客吧，以前的51路可不是这样，我们光在起点站等车就得一个多小时哩！现在……”他没有说完，就登上车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是亲眼看到了。可是过去究竟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来到了车队的调度室。一位上了年纪的调度员告诉我们：“我在这里工作十多年了，随着吴淞工业区的新建和发展，加上大批知识青年奔赴郊区、农场闹革命，51路的客运越来越忙了。本来嘛，人多了，车加多就是，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上班的人们，谁不想及早上车赶到目的地呢？可是，人只能一个一个上，车只能一辆一辆发，大家争先恐后，你越是想快，越是快不了。一进入高峰期间，乘客候车排队象长城，车等乘客结成龙，真是‘人等车，车等人’。排队上车等上七、八十分钟那可是家常便饭啦！”

“人等车，车也要等人？”我们觉得这个矛盾挺有趣，很想知道那是怎么解决的。调度员继续往下说：“这个矛盾可伤脑筋啦！乘客急，我们更急。北站到吴淞，51路是一条重要干线，每天担负着近十万人次的客运任务，单是早晨高峰期间就有二万多人次。这就象四面八方的支流，汇成洪

流，再从一个出口奔去，人多口子窄，一下子就卡住了。要解决问题，就得摸清乘客的来往流向，搞清客流布局，多设置几个出口。有一段时间，我们车队的干部和站务员分兵几路，尾随乘客查来龙去脉，心中才慢慢地有了一本‘客谱’。比如，住在南市区陆家浜附近的乘客，大多是上钢一厂、五厂的工人，他们到吴淞上班，得先乘66路到北站转51路；其他如东区提篮桥、控江新村一带的乘客也很集中，都要转几次车。根据乘客的要求，我们就在陆家浜、提篮桥、控江新村等地增设车站，按‘一条龙’设跨线车，使这些地区的乘客不必绕鸿兴路车头转车，而能就近上车直达。这样一来，把高峰期间的密集的客流分散了，鸿兴路起点站的压力也就小了。”

正当我们听得入神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同志插嘴了。站务员风趣地介绍说：“他是我们公交战线的义务服务员。”

“公交战线的义务服务员”，这个名称多么使人尊敬，却也使我们好奇。我们正想问个究竟的时候，那位同志乐呵呵地作了自我介绍：“我是在钢铁厂搞后勤工作的。51路车队的同志常来我们厂作调查，相互都熟悉了。我们厂住在控江新村、陆家浜、提篮桥一带的工人能就近乘上直达车，都很高兴。可是，还有好多工人要从鸿兴路上车，一进入高峰期间，还得排长队。主要原因是上班时间太集中。51路车队的同志同我们商量，把各车间、部门的上下班时间适当错开，又把我们厂和其他单位的上下班时间适当作了调整。这样一来，进一步分散了高峰期间的客流。51路

车队根据不同情况，还设立了定班车。我有个邻居，她在泰和路钢铁研究所工作。从泰和路车站到钢研所要步行二十多分钟，遇到天气转冷，或者刮风下雨，更不方便。51路车队根据乘客的要求，便直接把汽车延伸到钢研所门口。他们这种急乘客所急的精神，使我们很受感动。厂领导经常说，解决客运矛盾，不能光靠公交部门，我们每个单位、每个乘客都有责任。所以，我们一有空就出来配合51路车队做点工作。”

51路车队的同志们，在社会上各方面的支持下，在解决高峰期间“人等车，车等人”的矛盾这个问题上，做的工作是多么感动人啊！又是多点发车，又是跨线直放，又是调整时间，不同的措施，都有一个主攻方向，叫做“削高峰”。从“车等人，人等车”到“人分散，车分散”；变“一点的人多”，为“多点的人少”；使一个起点站的“高峰”转化为几个起点的“低峰”，从中我们不是可以得到深刻的哲学启示吗？

长途与短途

从北站的鸿兴路到吴淞工业区，51路汽车沿线长达十五公里。在车上，我们又听到了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的许多反映。

吴淞化工厂的一位工人同志，对我们讲了当初长途乘客与短途乘客的矛盾情况；在设立了长途直达快车以后，每天早晨鸿兴路周围的长蛇阵，突然好象被斩了尾巴似地短

了起来。我们在起点站候车的时间大大缩短了。谁知车到中途，老是碰上麻烦事。车门一开，一些短途乘客哗哗地拥了上来，眼看车厢挤得密不透风，可下面的乘客还在一股劲地挤着、推着。售票员放开喉咙喊：“请乘客们不要挤了，下一部车马上就到！”车下的乘客急得直跺脚：“不行！这一趟车挤不上，上班就要迟到了！”有的说：“以前还是三、五分钟一班车，现在等上七、八分钟还不见下一班车！”还有人在嘀咕埋怨，“你们光照顾吴淞地区的大厂，我们途中的小厂就不管啦！”这一来，我们可苦了，站站停，站站吊，站站吵，起点站候车排队的时间虽然短了，可途中耽误的时间反而长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当时身历其境的售票员告诉我们，原来，一部分车辆调到新设的点跨线行驶以后，从鸿兴路到吴淞地区的车就相应地少了，因而站站停的慢车次数也就少了，沿线小站的短途乘客因为久等挤不上车直叹气；起点站出发的长途乘客因为站站吊直发急，这真是长途影响了短途，短途又连累了长途。

这时，陪同我们跟车访问的车队干部说：“长途和短途的矛盾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当着增点发车、跨线放车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是长途乘客；当着增点发车、跨线放车之后，短途乘客的要求就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经过实地调查。原来，在51路途中，从同兴路到三门路一带，小厂集中，短途乘客也多，这股短途客流从‘头部’袭击了长途乘客。过了江湾镇以后，沿途附近居民

出入吴淞镇的多，这股客流又从‘尾部’牵制了长途乘客。只有在头尾之间，才是长途乘客的‘安全地带’。很明显，在同一条线路上，不同的地段和不同的时间，客流也表现出不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不顾矛盾的特殊性，照样按部就班地从起点到终点来回行车，必然造成有的地段乘客太多，车子‘吃不了，吊着走’；有的地段乘客太少，车子‘吃不饱，空着跑’。后来，我们干脆来了个‘长归长，短归短’，一部分车辆固定在短途乘客集中的地段小调头，来回行驶；一部分车辆直达专送北站到吴淞的长途乘客……”

话音未落，我们发急地问：车子本来就不多，这样一来，更加分散，每辆车发出的间隔时间不是更长了吗？

“不！反而短了。”这声音是多么熟悉啊！原来那位上了年纪的老调度员正在车上听取乘客和售票员的反映。他一听我们的发问，就接上了话：“采取了各种办法调度车辆以后，看上去是分散了，实际上却是集中了；看上去车子少了，实际上车子反而多了。因为发车合理了，车子的周转率就大大提高。比如，过去从起点站到终点，由于站站吊，一个来回得九十四分钟，现在快放直达，排除沿线短途干扰，七十四分钟就能打回转。到三门路，过去来回要四十四分钟，现在设立了区间车只要三十分钟。我们算了一下，长途和大站区间等于挖出了七辆大车的潜力，短途等于增开了十九班车次。周转一快，发车的间隔时间不是长了，而是短了。我们在实践中感到，人还是那么多，车也还是那么多，从实际出发来个巧安排，是大有潜力的。”

我们在51路沿线访问了不少乘客。听下来，短途乘客和长途乘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一般地说，短途乘客希望站站停，发车间隙短；长途乘客则希望发直达车，中途少停或不停。这个矛盾看起来是对立的，你照顾了长途乘客，短途乘客有意见；你照顾了短途乘客，长途乘客又有意见。要求虽然不一样，目的都是一个，都是为的急着抓革命、促生产，争取少在途中磨时间。公交部门的同志，面对这样复杂的矛盾，顾此不失彼，使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各得其所，这就有力地说明：只要掌握和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就能处理好各项复杂的矛盾。

当时，我们想：高峰期间“人等车，车等人”的矛盾解决了，沿线长途乘客和短途乘客的矛盾解决了，总归一切都太平了吧。然而，事实告诉我们，矛盾还多着哩！

在意外的情况下

有一次，我们在车上遇上几位崇明农场的知识青年，给我们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由于天气变化，开船时间推迟，春节前从崇明开往吴淞的一班客轮，要延误到凌晨一时才能靠码头。当时，满船乘客直发愁，四十分钟一班车，当班赶不上就得等下一班，弄不好有一部分人要在码头上过夜。谁知船一靠岸，码头边排列着一辆辆公共汽车，及时把四、五千旅客送到了上海……

听完这个故事，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在这种意外

的情况下，51路车队的同志们怎么能这样服务到家呢？

在意外的情况下怎么办？这又是一个谜。

有一位驾驶员给我们讲述了他亲自碰到的一次意外情况：“有一天早晨，我刚出车，一看站头上候车队伍特别长，大多是陌生面孔。这些新乘客，一下子就冲击着按正常班次上车的老乘客，车站上你推我嚷，顿时乱了套。一了解，原来吴淞一家大厂正在搞设备检修，上级领导从其他行业组织了五、六百人来支援，这批新乘客就是协作大军。这个意外的矛盾，我们是靠向车队联系，临时增调车辆解决了。”

难道每一次意外情况，都是靠临时措施来对付？我们参加了车队一个工人学哲学小组的讨论会，终于揭开了这个谜。有个站务员说：“搞什么工作，都会碰到意外的。这个‘意外’就叫做‘偶然性’吧！能不能变意料之外为意料之中呢？偶然性中是不是也包含着必然性呢？象轮船误点和工厂检修这样的事，有时是难以预料的，但偶然的变故总归都要受到必然性的支配。工厂常年生产，总是要搞设备检修的，气候的变化对车船班次或多或少总是有影响的。如果我们能够提高自觉性，主动去研究千变万化的客观事物，就可以把许多意料之外转化为意料之中，从偶然性中掌握必然性，工作就会主动得多。”

站务员的一席话，引起了我们广泛的联想：

你看，公共汽车上的服务员，经常手里都拿着一个本本，在认真地记录着客流变化的时间和人数；

你听，公共汽车站头的服务员，经常在热情询问乘客的

来龙去脉；

你是否知道，乘客集中的单位，不知收到公交部门多少封征求意见的信件和调查表格，不知接待过多少次公交部门来听取建议和商量改进办法的同志；

你是否知道，在天气变化的时刻，在节日、假日的前后，公交部门挂发了多少个询问情况的电话……

公交部门的同志就是在这样一桩桩、一件件的具体工作中，摸索着客流规律，掌握行车的主动权，不断提高了为工农兵乘客服务的质量。

亲爱的读者，城市客运会碰到多少意外的情况，你数不清。公交部门的同志为了对付意外的情况有多少动人的故事，你数不清。现在，我们在调查访问中知道的也只是其中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

短促的访问，我们学到的东西是很多的。51路车队的同志们，那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那种把方便让给乘客，把困难和麻烦留给自己的高尚风格，都是十分感动人的。广大乘客曾经送去一些什么样的感谢信，这些就都不说了。我们唯一要补充说的是，这次调查访问是一堂生动的哲学课。51路车队面临复杂多变的情况，坚持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坚持在反复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想方设法，坚持在有限的物质条件下去无限地努力做好工作，这不正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广大群众所掌握的一个缩影吗？

（载《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四年第四期）

他们在摸索城市供水的规律

——上海自来水公司访问记

章 智 明

住在上海这个大城市里，一拧开水龙头，水就哗哗地流出来了。可是，当你用白花花的水洗涤着衣物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上海供水战线上的同志为解决几百万人口的用水问题，是怎样进行大量工作的？

我们从一份资料上看到，国民党时期的旧上海，全市只有五个破烂水厂，许多劳动人民喝的是井水、浜水和江水，用水之难，不知带来了多少苦难辛酸！解放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突飞猛进，全市自来水的日供应量迅速提高了五、六倍，不断满足了千家万户的用水要求。这种变化是怎样来的？为此，我们走访了上海自来水公司和战斗在供水战线上的其他一些同志。

“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

水是从水厂流出来的。按照一般的常识，要增加供水

量，只要新建一批水厂就是了。然而，自来水公司的同志却告诉我们，新建一个水厂，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既要添设备，又要排管道，建成一个厂并开始供水，起码得花上三、四年。而用户呢，却迫切希望我们立刻把水送到他们手里。所以，解放后虽然也建造了几个水厂，但如果光想等添造水厂来增加供水量，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远水解不了近渴”！怎么办？大家心里就象有把火在烧。还是水厂的工人同志群策群力，为改变供水量不足的局面闯出了一条新路。

于是，我们来到了南市水厂。奔流不息的黄浦江从它身边蜿蜒而过，机泵隆隆，江水哗哗地被汲进一个个水池。接待我们的一位工人干部笑着说：“这些池子叫沉淀池和滤水池，仗就是在它们身上打响的。因为混浊的江水进厂后，首先要到这些池子里经过混凝、沉淀、消毒、过滤等一番功夫，才能成为合格的净水出厂。开始，有些人以为，我们厂只有十个池子，每天出二十万吨水，早就是‘猴子爬树梢——到顶啦’！常言道，‘多大的鸡生多大的蛋’，供水量要提高，池子就得增加。可是工人群众却没这样想。他们讲，‘不造池子也能增产，小鸡可以生大蛋！’”

“小鸡可以生大蛋”！这话讲得多有志气。我们急着想问个究竟，那位工人干部又绘声绘色地讲了起来：原来，沉淀池的主要作用是把江水中的污泥浊垢在涤荡中沉到池底。按照水厂的老规矩，江水进入沉淀池后，要在池中放入定量的混凝剂，再用搅拌机搅拌，使水中的垃圾垢脚渐渐地

结成一朵朵矾花，沉到池底。工人们经过调查和分析，发现出水量所以不能增加，和沉淀周期的时间长有很大关系。能不能缩短沉淀周期呢？他们破例地作了一些试验。比如，稍许多加一点混凝剂，矾花就结得大了，一会儿就下沉了；把搅拌速度加快一些，矾花也比往常结得快了，没多久，一池混浊的水就变得碧蓝明净起来。可见，出水量的多少虽然和沉淀池的大小、多少有关，但往往还取决于沉淀周期的长短。明白了这个道理，工人们就在保证水浊度正常的前提下，大胆地改革了旧的操作规范。为了让矾花沉得更快些，工人们还在沉淀池的进口处搞了个水槽，用竹篱笆隔成一条九曲桥式的弄堂，水流在里面七顶八撞，矾花也就加快沉淀下来。这样，流速比原来加快四倍，出水量也跟着翻了四番。

我们全神贯注地听着，心里想：“缩短滤水周期是不是也用这个办法”？那位工人干部好象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就把话头转到滤水池上：

从沉淀池出来的水还需进一步剔除杂质，这个任务是由用黄砂、卵石等滤料垒成的滤水池来完成的。缩短滤水周期就是提高滤速。于是，工人们把滤水池的控制闸放大，把滤料中的黄砂换粗。结果，水是流得快了，水质却受到了影响。这一关不过，不就前功尽弃了吗？正当大家发急的时候，在一次群众性的献计献策会上，有人提出：“问题出在滤水池的水浊度上，根子会不会在沉淀池的水浊度上？”这一问，开了大家的窍。原来，我们要求在沉淀池中保持的水

浊度,只是相对原来滤水池滤速较慢的情况而言。很明显,后天失调在于先天不足。要提高滤速,还要进一步降低沉淀池的水浊度。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工人们又给沉淀池动了一次“手术”。果然,前一关卡紧了,滤水池的滤速尽管加快四倍,出来的水却照样清晰透明,池池够格。

这真发人深思。今天,上海全市在解放后增加的供水量中,就有百分之七十是靠缩短生产流程等办法挖掘潜力的。这说明,生产也是一个运动过程,“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空间和时间之内才能运动”。时间是和空间互相联系着的,空间上得不到的东西,可以创造条件从时间上获取。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小鸡可以生大蛋”这句工人群众的豪言壮语中,蕴含着多么深刻的哲理啊!

他们怎么还不能舒畅地用水?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有了‘米’,那总该万事大吉了吧!”我们这样想。可是,事实却不是这样。公司的同志还告诉我们:供水量提高后,从总体上看,这和全市的用水量是适应的。但有些用户还是经常来信来访,反映他们那儿缺水、断水的情况……

“水厂有水,用户没水”,这确实是一个费解的现象。为了解开这个谜,我们来到了公司调度室,参加了他们的一个小会。

会议是在毗邻调度室的一间屋里开的。调度室的负责

人告诉我们：这里的工作主要是依据全市用水状况，合理分配各个水厂的出水量。“水厂有水，用户没水”，显然是由于我们调度不当的缘故。那么，怎样才能调度得当呢？我们多次走出调度室，进行实地调查。有的用户告诉我们，他们那儿在平时，水龙头一拧，水就哗哗直冲。偏偏到了烧饭、洗澡时，水反而“滴滴嗒嗒”了。有的用户反映，他们那里的水，一直象涓涓细流。有些住在高层建筑的居民则对我们说：“这里的用水可真苦恼！龙头一开，经常是干巴巴的！”这才使我们心中更有了底。原来，光知道一部分用户的用水困难，这还只是看到矛盾的普遍性一面；矛盾的特殊性一面是：这些困难有的产生在用水比较集中的时候，有的产生在离水厂较远的地区和高层建筑。懂得了这些不同之处，我们也就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逐步求得解决。

到底想了哪些办法呢？坐在我们身边的一位老工人比划着讲了起来：“用水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称它是高峰期间。‘高峰’一来，用水量直线上升；‘高峰’一过，用水量又很快下降。一高一低，就造成了有时用户用不到水，有时水厂有水用不掉。我们就常常被这‘高高低低’搞得手忙脚乱。其实，这‘高高低低’不是反复无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讲，在白天，工厂要生产，居民要烧饭洗菜洗衣服，用水就多；饭后和晚上，工人和居民大都在休息，用水量就明显降低。上海这个城市，用水量的变化往往表现为上午和下午两个‘高峰’及午后和晚上两个‘低谷’。后来，我们就来个调低济高，有的放水。譬如，在一些中枢地区建

造水库唧站，每逢‘低谷’，就把水厂多余的水贮到里面，一临‘高峰’，再把它调剂出去。现在，全市水库唧站的贮水量有二十万吨左右，为解决高峰期间用水紧张可出了一把力！”

话音未落，另一位中年师傅插上来为我们讲了解决离水厂较远的用户用水困难的情况：水从水厂出来，挨家挨户地流着。水管的水流量是有一定限度的。“近水楼台先得水”，近处住户用水的胃口一大，远处住户的用水就困难了。怎样使水流得远呢？我们在途中建造了水库唧站，把周围用户在“低谷”时用不完的水贮藏起来，用来支援远处，结果，还是不能彻底改变“远水楼台不得水”的局面。怎么办？原来有些唧站的贮藏量并没有“吃足”，水厂也笃定可以再多给它一些水贮藏起来，问题是从水厂到唧站的沿途管网，腾不出机会来“喂饱”唧站。后来，我们从公交公司放直达快车的办法上受到启发，就专门排设一根专线管道到唧站；在管网上还有潜力可挖的地方，则抽调一根负担较轻的管道做专线，使水厂的水由这些专线管道日夜为唧站送水。经过试验，效果可好啦！譬如，从南市水厂到复兴公园附近唧站的一根专线管道，每小时能送四千吨水，一天就能把近十万吨水通过唧站送往远处。一些远处的住户看到“远水楼台不得水”的局面改变了，高兴得从老远跑来找我们道谢。其实，这还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本份事吗！

“那为什么有些高层建筑上的用水又会不舒畅呢？”这时，有位同志又作了回答：这是由于水压不够的缘故。水厂

为了叫水远流，又能爬上高层建筑，是用高压水泵把它“强行压送”进管网的。因此，刚出厂的水其势方张，压力甚高；流了一段路后，就象强弩之末，压力渐渐减退了。象长桥水厂，出厂时的水压有五十公尺高，流到离它约二十公里远的天山新村时，却只有七、八公尺了。这样，五楼上的水龙头就难免有时滴滴答答了。起先，我们让长桥水厂把水压再打高些，结果还是不顶事，鞭长莫及嘛！解决问题还得再作深入的调查。后来，我们索性对从长桥水厂到天山新村的沿途用户进行了一次访问。发现从水厂到中山西路一带，平房为多，工厂用水量也不太大，水压低些关系并不大；从中山西路到天山新村这一带，却几乎大部分是化工厂和高层工房，他们都希望水压越高越好。而实际状况却是：前一带虽然处于水压的兴盛时期，却是白费劲；后一带急着要水压高的水，却又碰上了水压的衰微时期。于是，我们把全程分为两段，在中山西路造了个增压唧站。针对前一带用户的特点，让长桥水厂减低出厂水压；当水流经中山西路的增压唧站，再给它助一把力，变低水压为高水压。这样，天山新村的高层楼房中，龙头一拧，水就哗哗流了。

座谈会开得热气腾腾。我们被大家所谈的一些事例深深感动。在用水和供水的矛盾面前，供水部门的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对一部分用户“用不到水”的共同现象进行具体分析，看到了“共同”之中存在的各种“不同”，然后分别采取措施，使有限的水在合理调度中得到有效的使用，这里面不就充满着活生生的辩证法吗？

千千万万个水龙头从何抓起？

在参观访问中，给予我们的教育是很大的。由此不禁想到：做好城市供水工作不仅仅是供水部门的事情，也是一切用水单位、用水的人的共同义务。供水部门不断“开源”，提高供水量；用水单位不断“节流”，减低用水量。如此相辅相成，才能把社会主义的公用服务事业越办越好。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给自来水公司的同志，他们很赞成。下面所记录的，就是服务所的同志介绍抓“节约用水”的情况。

千千万万个水龙头从何抓起呢？起初，好些人觉得茫无头绪。后来，大家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的教导，就豁然开朗了。他们作了具体分析：全市有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等等，其中以工业用水量最大；在工业用水中，又有锅炉用水、冷却用水、原料用水、冲刷用水等，其中又以冷却用水量首屈一指。要抓，就得抓主要的。否则，不分主次先后，轻重缓急，眉毛胡子一把抓，到头来样样抓不到。于是，他们又到冷却用水量较大的工厂进行调查。原来，冷却水主要用于降温，水温一升高，工厂就只好把它白白流入阴沟。其实，只要设法把水温再降低下来，它还是可以重新作冷却水的。因此，这些同志又找有关部门研究，设计制造了一种叫点波冷却塔的回冷设备。高温水进入这种塔后，如同走进了冰箱，水温迅速降低。这样，

冷却水就可循环往复，多次利用，每天就能节约十万吨水。

“西瓜”要捧，“芝麻”也要捡。抓了工业用水的节约工作，也要抓好生活用水的节约工作。这里，还得采取“牵牛要牵牛鼻子”的方法，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的、关键的问题。唯有如此，方能事半功倍。工人师傅依据历年来的工作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平时把龙头的“老”和“少”两种人的思想教育上。他们经常穿巷走弄，组织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回忆旧社会拎着水桶排队候水的生活，使用户们自觉实行“用多少放多少”，“一水多用”，“为战备用活土井”等节水措施。他们还有步骤地组织孩子们到水厂参观，讲述自来水的生产过程，让孩子们懂得点点滴滴的水都凝结着工人的辛勤劳动，教育他们从小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这一抓，全市每天的生活用水又节约了三、四万吨！

当着工业用水、生活用水的节水措施尚未落实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用户；而当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又回到了供水部门。这是工人们从每月水厂的出水量和用户的用水量往往相差一大截的对比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大截怎么会不翼而飞呢？原来，管道铺设在马路下面，年久月深，上面车来人往，土层受震松动，管道受到各种挤轧和压力，有的接口处就会发生裂缝，使自来水大量流失。于是，他们就专门成立了一支“听漏”队，专治管道漏水。一临万籁俱寂的深夜，这些管道“医生”就出门巡诊。单是去年一个年头，他们就查出了一万多个漏眼。有一次，他们到一家制药厂征求意见，发现那儿的生产规模并没有大

的变化，用水量却从每月的五万吨一下跳到七万吨。会不会是厂内的水管有“病”呢？他们利用药厂的厂休日上门“会诊”，果然找到了厂内有两根管道严重漏水。经过抢修，药厂的用水量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就这样，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着重于捉住主要的矛盾”的指示，打开了节约用水的门路。现在，全市节约的水量已相当于一个中型水厂的生产能力。可见，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下，“开源”和“节流”是统一的。“开源”不忘“节流”，“节流”促进“开源”。

人们每天都要用水，供水战线上的同志也每天都在为人们能够舒畅地用水而进行大量默默无闻的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每个同志在用水时注意节约，就不仅仅是珍惜一滴水的问题，而是珍惜工人人们的辛勤劳动。

当我们整理完这篇访问记，觉得尽管这里所反映的，仅仅是供水工作中的零星片断，然而，正是通过这一个断面，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和其他各行各业的劳动群众一样，供水部门的工人和干部，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革命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何等充分的发挥。这种革命实践活动是自觉地以毛主席哲学思想为指导的。他们不仅注意把工作中大量零碎的初级的感性认识上升到深刻的系统的理性认识，而且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和形而上学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批判。在沸腾的斗争生活中，把实践中的哲学总结出来，使它在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发挥更能动的作用，这是我们工人理论队伍的光荣任务。

（载《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一期）

扫马路见闻

——在长治路清道班的半个月里

上海师范大学 阎水金

上海公交公司汽车一场 陆晓禾

我们俩，一个是上海师大刚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公交汽车一场的售票员。最近，我们都参加了有关部门举办的一个哲学学习班，班里提出虹口区长治路清道班哲学学得不错，我们就跑到这里边扫马路边调查学习来啦！

说老实话，开始我们心里还真有点纳闷呢！清洁工人扫马路，一把扫帚，一只畚箕，这里能有什么大学问？但是，俗话说得好：“看人挑担不吃力”。扫马路的头一天，我们俩就出了“洋相”。一把大扫帚在清道班工人师傅手里轻巧得很，可在我们手里偏偏就是不听话。工人师傅已经扫了一大段马路，我们却还在原来的那段路上忙得团团转。马路两边的垃圾，一边多，一边少，我们为了图快，就专拣多的一边先扫。可是，我们前脚刚扫过，后脚就刮来一阵风，吹得满地又都是垃圾，只好重新再扫。一位老师傅见我们累得

满头大汗还是扫不快，就走过来微笑着对我们说：“二位同志，你们扫马路还得注意风向，上风头垃圾少，下风头垃圾多，下风头的垃圾都是上风头刮来的。扫马路要先扫上风头，再扫下风头，这就叫垃圾跟风走，人要顺风扫。”短短几句话，顿时使我们心里开了窍。照着她的话去做，果然扫得又干净又省力。

扫马路确实有学问呢！“垃圾跟风走，人要顺风扫”，这句话就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哲学启示。它说明世界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和其它事物相互联系着的。扫马路由于是“露天操作”，和许多自然条件有着密切关系。“垃圾跟风走”，正是反映了垃圾和风的关系。因此，要扫好马路，首先就要找出垃圾和周围事物的联系，从中引出其固有的客观规律。“人要顺风扫”，就反映了对这一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掌握。如果是盲目地乱扫，结果就只能吃力不讨好。

要真正掌握扫马路的规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必须对客观事物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就拿扫马路中经常遇到的旋风来说吧，过去清道班的工人师傅见到这种风最头痛，都叫它“鬼头风”。有时两三个人，畚箕对畚箕，扫帚挟扫帚，好不容易扫拢了一堆垃圾，可是一阵“鬼头风”，就把垃圾又卷走了，气得工人师傅只好扔扫帚。后来，学习了毛主席的《实践论》，他们就注意在实践中观察“鬼头风”的踪迹，留心各种现象。有一次，他们发现许多被“鬼头风”吹得团团转的垃圾，突然在一处停住了。这是怎么回事呢？上前一

原来是一摊水把垃圾沾住了，这下可解决了问题。再仔细一观察，发现了在房屋高低交错、转弯抹角的地方最容易发生这种“鬼头风”。于是，他们扫到这种地段的时候就先泼上一点水，这样“鬼头风”再“鬼”，也不能把垃圾卷走了。这件事说起来简单，却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客观事物尽管是相互联系着的，但光凭老经验办事是掌握不了规律的。只有在实践中积极主动地进行调查研究，才能自觉地发现事物间的这种联系，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做好各项工作。

实践出真知。几年来，长治路清道班的工人师傅，正是在向自然环境的调查中，掌握了许多在不同的气候、季节情况下工作的特点。比如，秋冬之交，树叶经过一夜的霜冻，早晨太阳一晒，都变得很脆，加上无轨电车“小辫子”的拍打，到上午九点多钟树叶掉得最多，他们就在这时候注意勤扫多扫。他们还发现，每年十一、十二月份，总有几次树叶大落，而每次大落的前几天，天气总是突然闷热，接着就是刮一场大风，下一场大雨。掌握了这个气候变化的规律，他们就提前做好突击的准备，使路面做到及时扫清。又比如，过去下大雨，把马路冲得又光又亮，有的同志就说，清道工作是“大雨大礼拜”，“小雨小礼拜”。但是雨过天晴，阴沟盖附近以及马路低洼的地方，都积满了泥沙和垃圾，扫帚扫不掉，还得用铲子铲。后来他们就反其道而行之，来个“大雨大干”，“小雨小干”，一下雨就用扫把勤刷路面、沟底，这样，天一晴马路就干干净净了。

掌握自然规律的特点，这还仅仅是做好清道工作的一

个方面。马路上车来人往，络绎不绝，许多垃圾都是车辆行人丢下的。因此，在清道工作中历来有一个“一人扫”和“百人扔”的矛盾。这个矛盾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又请教了清道班的工人师傅。在长治路上扫了十几年马路的朱雪珍师傅对我们说：“过去碰到这个矛盾可伤脑筋啦，往往你刚扫清爽一会儿，果皮杂物又扔了一地。有些行人吃甘蔗，一路吃，一路扔，跟着他们扫还来不及。特别是夏天食品店门口，满地都是棒冰纸，风一吹，到处乱飞，路面简直没有干净的时候。”

“那这个矛盾怎样解决的呢？”我们急切地问。

朱师傅说：“开始我们也是干着急。后来我们就对这个矛盾进行了具体分析，感到这个矛盾并不是不能解决的。‘百人扔’对我们清道工来说是多数，但在整个社会上还是少数，再说这些人扔垃圾往往是不自觉的，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在前面，就可以尽可能地缩小这个范围。根据我们的分析，人为制造的垃圾主要有三种类型：一类是商店门口。比如水果店，一年四季瓜果不断，各种瓜皮果壳扔得很多，我们就与商店取得联系，在店门口多放几只废物箱，还同商店一起建立了开门扫、中午扫、关门扫的‘三扫’制度，保持店门口的整洁。另一类就是马路附近的居民造成的，主要是炉灰、菜皮等垃圾。我们就掌握他们出炉灰、拣小菜的时间，做到及时扫清。再就是行人。这一类人虽然比较复杂，但也不是没有规律。比如，马路冬天有太阳的一边，夏天阴

凉的一边，行人多，垃圾也多。电影院、车站等热闹的地方，行人停留多，垃圾也比较多。根据这些特点，我们就采取‘适时扫’、‘巡回往返扫’等办法。而且，我们还利用废报纸做了许多纸袋，看到行人吃东西，就主动送上去，好让他们集中起来丢进废物箱。这样，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方法处理，清洁工作就好做多了。”

这时，旁边的一位老师傅插进来向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情况：在她清扫的地段中，有一段人行道上总是零零星星地散落着垃圾，看来也不是有意扔的，并且天天如此，月月如此。他们抱着寻根究源的态度，顺着垃圾一路追踪下去，发现垃圾在一家门口停住了。敲门进去一问，原来这里住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由于子女都不在家，只得自己一颠一拐地到三十米外的地方去倒垃圾，年纪大了，手发抖拿不稳畚箕，倒垃圾时经常走一路撒一路；碰到下雨天，就干脆把垃圾倒在马路上，影响了环境卫生。这件事说明，某些垃圾的产生是由各种特殊的原因造成的，这就需要用特殊的办法处理。后来他们就主动轮流到这位老太太的家中帮助倒垃圾，终于保持了路面的清洁，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看这件事，我们又得到了一个启发。”朱师傅接着说：“这位老太太可以说是一个特殊情况，但是，矛盾的特殊性中包含着矛盾的普遍性。我们清道班工人到有困难的居民家中帮助倒垃圾，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反过来，这种新型关系也反映在社会各个方面对清道班工人的支持上。如果就事论

事地看待‘百人扔’和‘一人扫’的矛盾，这个问题是永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清道工作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但是，毛主席提倡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广大群众中有深厚的影响，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使‘百人’扔垃圾，变成‘人人讲卫生’，不就可以转被动为主动，化清道工作中的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了吗？毛主席说：‘动员起来，讲究卫生’。这就是说清道工人不仅要扫垃圾，还应当依靠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做到大家不随手丢垃圾，一起来搞好环境卫生，这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完全能够做得到的。于是，我们除了自己经常到影院、车站等人多的地方做好宣传工作外，还和学校、街道取得联系，组织退休工人和学生上街宣传爱国卫生。结果矛盾很快发生了转化。过去有些行人吃完水果，就随便把果皮往地上一扔，现在却主动协助我们搞好卫生工作；有些小学生过去在马路上玩打仗游戏，把黄沙石子扔了一地，现在不仅不扔，而且主动操着土喇叭在路边帮我们搞好卫生宣传。这样，扔垃圾的人少了，讲卫生的人多了，‘百人扔’和‘一人扫’的矛盾就较好地得到了解决。”

听到这里，我们的脸不禁红起来了，联想起自己经常在车上售完票后，就随手把票根往窗外一扔，吃完东西时也往往把废物随便乱丢，自己是方便了，清道工人却增添了许多麻烦。亲爱的读者，当你随手往路上扔糖纸、果皮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清洁工人为了保持我们的城市环境卫生，他们是付出了多么辛勤的劳动啊！

我们的调查越深入，感受也就越来越深。长治路清道班的工人同志为什么能够这样自觉地进行调查研究，掌握扫马路的规律？原因正如工人老师傅说的：“要扫清马路上的垃圾，首先要扫除思想上的垃圾，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是啊，同样是一把扫帚，一只畚箕，有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清道工作的效果就是大不一样。过去，有些同志由于思想上看不起清道工作，扫路时敷衍了事。附近的饮食店、居民对他们很有意见，批评他们是“只顾自己扫，不顾灰尘飘”。有些青年受了社会上旧习惯势力的影响，扫马路时，帽子拉得低低的，口罩戴得大大的，看见熟人就扔下扫帚躲起来。后来，他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著作，才懂得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理。许多老工人还回忆解放前的清扫工，身穿“红马夹”，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受剥削，只有在新社会，清洁工才翻身当了国家的主人。清道工作和其他革命工作一样，都是社会主义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阶级觉悟提高了，头脑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也就牢固了。在班长赵雪云同志的带动下，全班同志忘我劳动，做到了“人不离马路，手不离扫帚”。每天天还没亮，他们就已把马路清扫干净。往往有时晚上十点多钟，当人们已经熟睡时，他们才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许多同志几年来连星期天也不休息，经常上义务班。班长赵雪云，有一次由于工伤事故跌断了臂骨，但她放弃了两个多月的工伤假，坚持用一只手握扫把扫马路。这样干

不觉得苦和累吗？这个问题可提得既聪明又愚蠢。须知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苦乐观。在资产阶级或受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那些人眼中，这样做确实又苦又累。但长治路清道班的老师傅却自有其革命的苦乐观。他们常常笑着说：“为人民服务嘛，这可是最幸福最光荣的事呀！”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做了许多看起来是“份外”的工作。清运工人来不及运走垃圾，他们去帮助推车，阴沟阻塞住了，工务所忙不过来，他们就帮着疏通阴沟。有时，他们还主动地帮助工厂整理马路仓库，把废纸、纱头、金属块等一点一点拾起来，集中售给国家。几年来，他们回收了废钢铁三十八吨，杂铜一千多斤，废纸、纱头近十吨，价值一千二百多元。他们还主动和水果店、陶器店挂钩联系，上门清理收集甘蔗皮、稻草头，运回站里烧窑砖，节省柴草三万多斤。这些“份外”事，看起来多么细小平凡，但只要能为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贡献，长治路清道班的同志都笑呵呵地乐意去干。批林批孔运动开展以来，他们结合批判林彪、孔老二“克己复礼”的反动纲领，开展回忆对比活动，进一步激发了为人民服务的责任感，决心精益求精地做好各项工作，为搞好城市环境卫生更多地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短短的半个月调查结束了，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长治路清道班。只是从现在开始，我们才真正懂得了什么是哲学，怎样去做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工作者。

（载《学习与批判》杂志一九七五年第三期）